中國共産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098-3741-2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Ⅳ.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3332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领衔编辑:黄　艳
责任编辑:黄　艳　王　兵　王世聪
装帧设计:闫　炯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610千字　408幅图
印　　张:65.25　5面彩插
印　　数:1—250000册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3741-2
定　　价:150.00元(全三册)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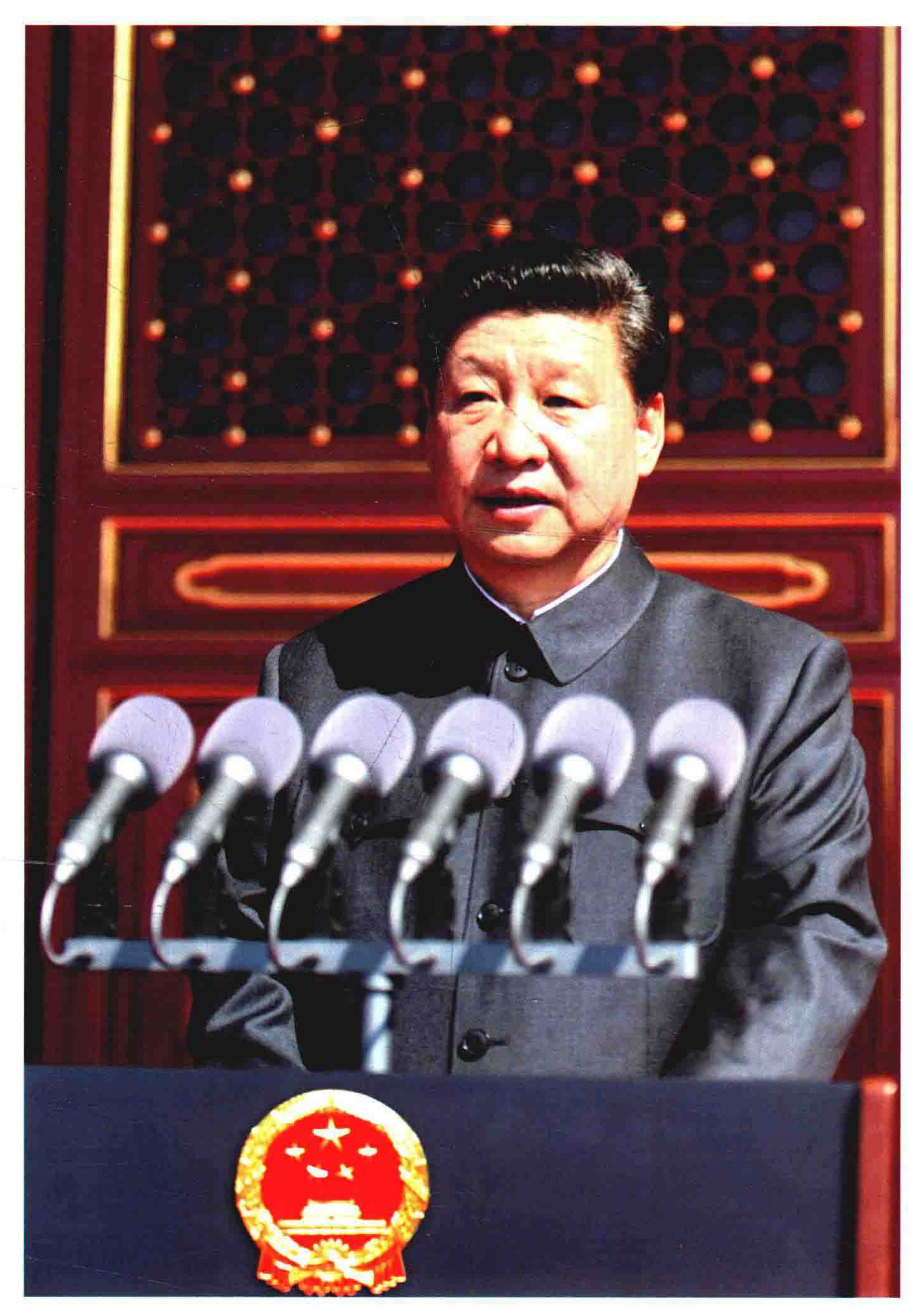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2009年10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本章提要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成立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丧失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

19世纪初，当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晚期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迅猛发展起来，向外实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古老中国遇到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1840年，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社会的发展脱开原有的轨道，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二是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其中著名的有1840年至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其他方法，掠夺中国的领土，勒索中国的“赔款”，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进而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支配中国的政治，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障碍阻止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推翻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任务。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 清末反映列强侵略中国形势的《时局图》（作者佚名）。图中熊代表沙俄，虎代表英国，蛇代表德国，蛤蟆代表法国，太阳代表日本，鹰代表美国。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力量软弱，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着支配的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连同雇农，却没有或只占有少量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把自己收获物的四成、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社会的上层建筑只能仍由封建主义占支配地位。近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政治统治，在辛亥革命前表现为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专制政权，在辛亥革命后表现为封建军阀官僚统治。"三纲五常"等旧礼教依然牢牢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其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又一个最根本的任务。

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下，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分别支持中国不同的军阀割据势力，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于分裂状态。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作出过较大贡献，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

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①]这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得牢固，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过上自由、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着的。前者为后者创设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首先进行革命，以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局限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

晚清时，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在维护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而这两者是不相容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851年洪秀全等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即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的高峰。1898—1900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英勇的斗争给予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能找

---

① 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963年9月、1964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到中国实现独立和富强的正确道路。他们的斗争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结束。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起来。与此相适应，中国产生了一批主张进行资产阶级式的改良、革新的人物。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维新派主张仿效西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施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以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力量太小。他们仅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企图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幽囚，维新运动瞬间夭折。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靠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地进行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正是由于看清了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1894年，孙中山曾写过《上李鸿章书》，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希望李鸿章能“玉成其志”，然未有结果。他后来讲过，自己原本是赞助那种“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运动的，只是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包括黄兴、章太炎、陈天华等人共同的思想经历。


★ 孙中山

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

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同盟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孙中山又把它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这场革命的直接任务是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由于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它实际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

在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下，1911年10月神州大地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领导。这个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给予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中国的反动阶级就乱了阵脚，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了。其次，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由于遭到广



★ 武昌起义军攻破清廷湖广总督衙门。

大人民的反对而归于破产。再次，它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它还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它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而奋斗。总之，它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局限：第一，它没有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纲领；第二，它没有比较广泛地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第三，它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微弱，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则严重地脱离。这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所窃取。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也太深刻了。它使得一些立志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先进分子对资产阶

①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

级共和国的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的途径。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辛亥革命影响很大的人，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参与创建或陆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则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的朋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①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神州大地孕育着新的革命风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重要标志。

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统治中国的主要是北洋军阀政府。

北洋军阀是在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支柱，以外国帝国主义为主要靠山。许多军阀本身就是大地主，并直接经营一些官僚资本企业。

---

①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10 日。

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连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了，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这些割据称雄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导致战乱频仍。

军队是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各派军阀竞相扩充军队。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军阀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利权为代价大量举借外债，并采取强售公债、强迫借款、滥发纸币，尤其是增加赋税等办法，对各阶层人民主要是广大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孙中山沉痛地说：当时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在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进一步加深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在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 页。

些[1]。在这期间，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报纸杂志的记者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具有更新的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2]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它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特出的优点。由于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它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尽管它的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它必然成为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压迫的加重和反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预示着中国将掀起一场新的革命风暴。而“五四”以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中国人民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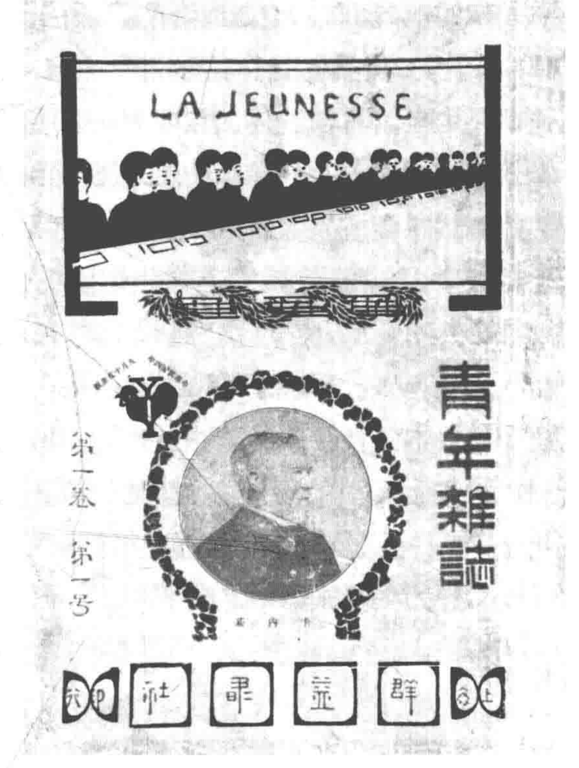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

---

①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7 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8 页。

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他们当时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按照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

秀最初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这表明，初期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而不是根本的社会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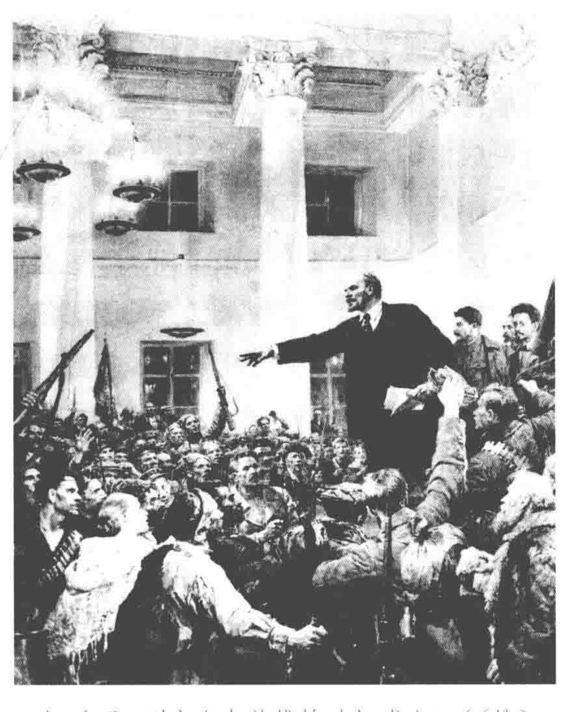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着重指出的是，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他们并且认为，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勇士。通过批判孔学，他们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需要指出的是，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有着很大局限性。它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但是，历史已经表明，提倡资本主义并不能为中国指明一条可行的出路。

事实上，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些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①]。他们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成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土壤。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这场革命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思想界已经有人谈论过社会主义。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



★ 油画《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俄〕弗·谢罗夫创作）。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①]；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也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②]。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进而促使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从1918年7月开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③]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

---

① 彭璜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新年会上的发言，《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② 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③ 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毛泽东在当时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①]。稍后，陈独秀也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②]。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这次和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后来的战胜国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及换文的陈述书。这两项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②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



★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一个学生当场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学生们情绪激昂，决定次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①]等口号。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一学生“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引发了大火。这就是“火烧赵家楼”这件事[②]。北洋军阀

①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

②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1979年2月），《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 上海商界罢市，发起声援学生的游行。

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被捕者32人。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2.5万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第一天，学生被捕者170余人；第二天，又有700余人被捕；第三天，2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进一步举行抗议行动。

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上海学生“沿街跪求”商人罢市之际，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就这样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全权委员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五四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蓬勃兴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因此，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

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在此前后，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他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些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

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发表。在美国留学的张闻天也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继续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下去。

1919年7月，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过，他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推动一些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时发生的一个新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也给予新的有力促进。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封锁，于1920年三四月间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这个宣言表示“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在中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反响。长期饱受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有人指出：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表明，陈独秀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

第二种，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①]。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②]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③]。

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④]。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

---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② 《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③ 周恩来：《致李锡锦、郑季清》（1922年3月），《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④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董必武的回忆》（1961年）。

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

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①]。事实上，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②]

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个突出的优点：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由于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部分学生领袖便"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③]。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在上海，陈独秀等人也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真正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

①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5 页。

②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6 页。

③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1930 年 6 月 19 日），《邓中夏全集》（下），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54 页。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但并不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①]。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这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18 页。

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然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为躲避军阀迫害，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并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经过考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



★ 陈独秀



★ 李大钊

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以下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

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58人）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陈独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德荣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汉俊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董必武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潭秋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望道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包惠僧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玄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伯垂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邵力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恩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袁振英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健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林伯渠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郑凯卿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雁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俊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杨明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叔衡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俞秀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彭　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启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贺民范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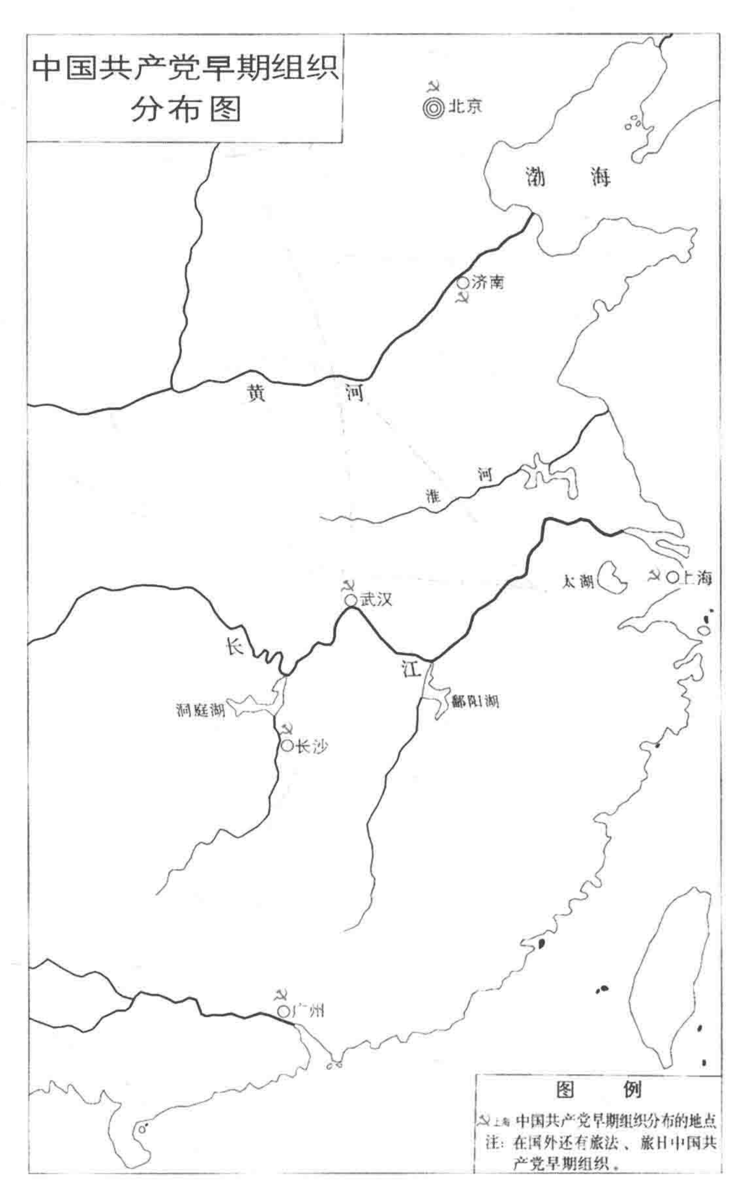
（续表）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李　中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易礼容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子博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焘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中夏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博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高君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植棠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孟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季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罗章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尽美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仁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恩铭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范鸿劼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翔千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缪伯英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申府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张太雷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恩来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李梅羹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清扬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朱务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世炎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宋　介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培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江　浩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施存统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吴雨铭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佛海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注：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人数，长期有不同说法。本名录采纳58人之说。

一些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造就最初的骨干。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布图。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

“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指出，我们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着优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不仅如此，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当时的中国马

克思主义者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时，必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①]。这种认识虽然还很粗略，但它对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驳斥了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②]。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应当实行“马克思还原”[③]。毛泽东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④]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

---

①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3 年 9 月 —1924 年 4 月），《李大钊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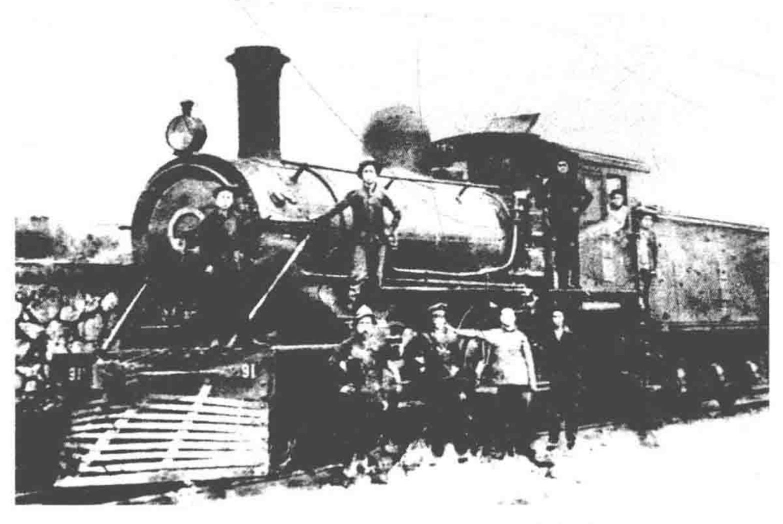
② 陈独秀：《谈政治》（1920 年 9 月 1 日），《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

③ 李达：《马克思还原》（1920 年 12 月 26 日），《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4、39 页。

④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 年 1 月 1 日、2 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370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1000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



★ 北京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工友们在火车头前留影。

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为书记。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这些组织后来因成分复杂、意见不统一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活动。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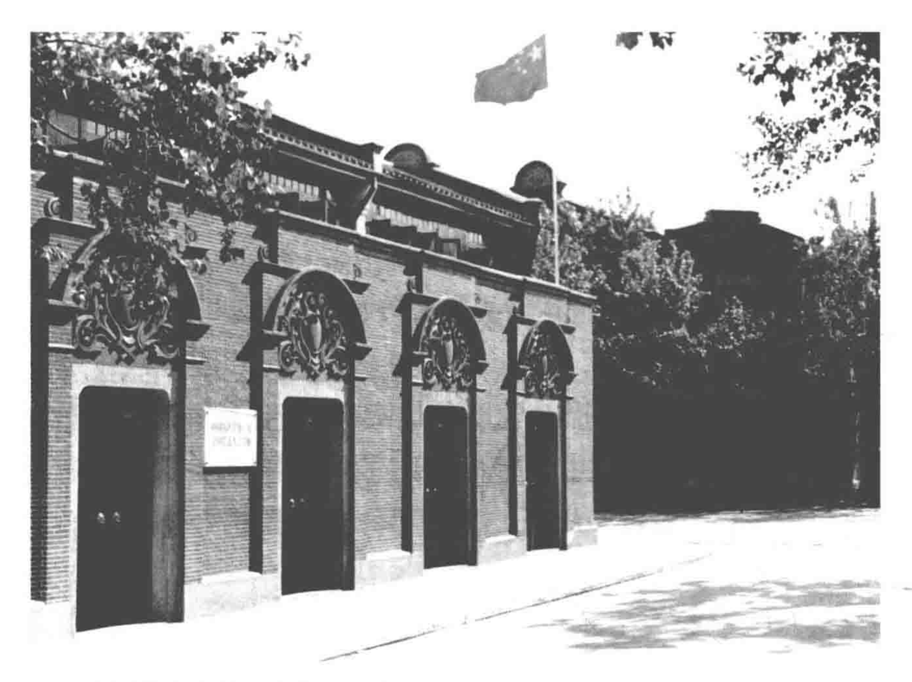
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①]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②]

---

① 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3月），《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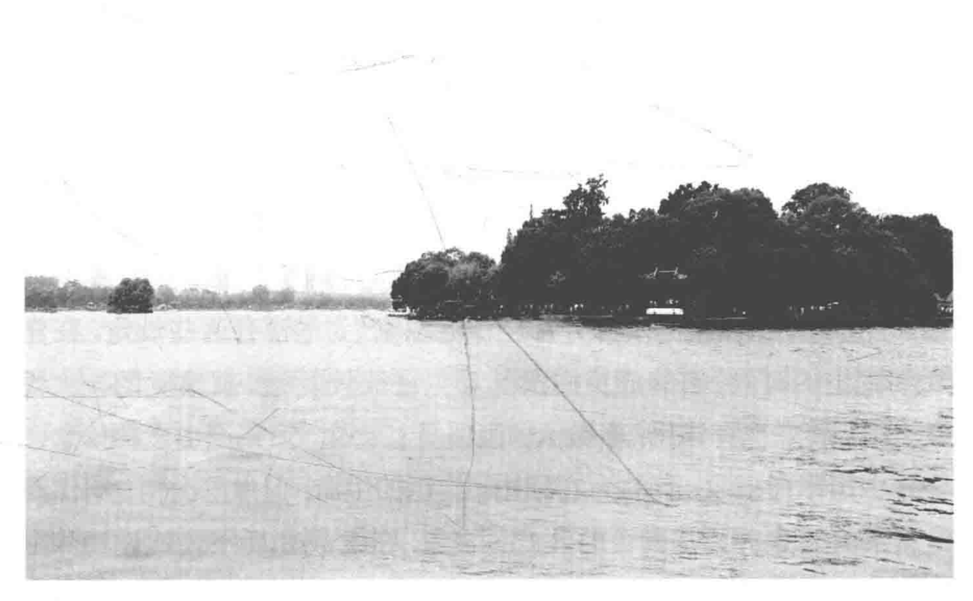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



★ 嘉兴南湖。

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和研究不多，对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

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这说明，党在成立时就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尽管有这些规定，在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来说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

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对症之方"[①]。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指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②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尽管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这个初生的党来说，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党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附庸，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在斗争的实践中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归根到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四、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着手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中国革命很快展现出了崭新的局面。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过长时期的斗争。这些斗争有重大的意义，但有两个根本性的弱点：第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这是以往的革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的两个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情况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这时，对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尽快制定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解决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即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先驱》的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

1921年底至1922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以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势头，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思想，对于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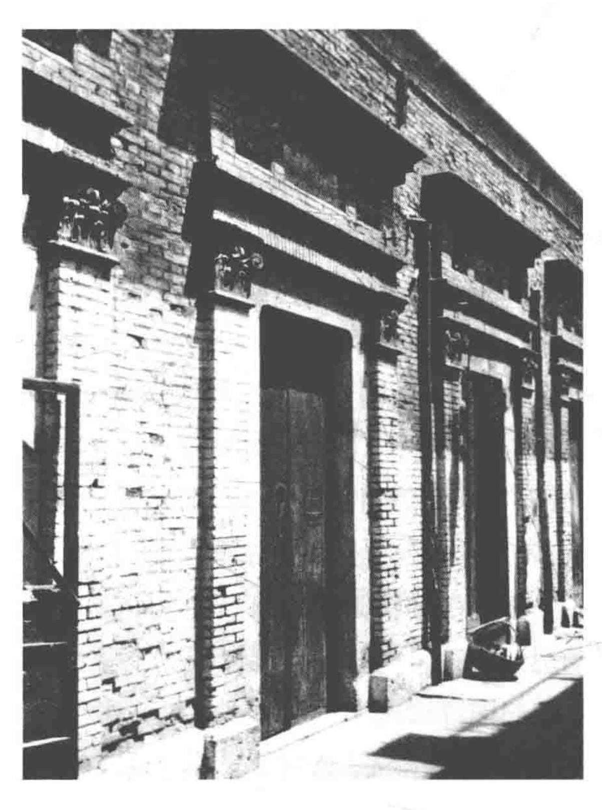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大会发表的宣言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实际上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大会宣言指出，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也“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宣言着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制定出了党在当前阶

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又指明了党的最高纲领。

党的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大会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之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原李达寓所，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痛苦，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大会还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大会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党的二大由于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而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党在当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也还有缺点。它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是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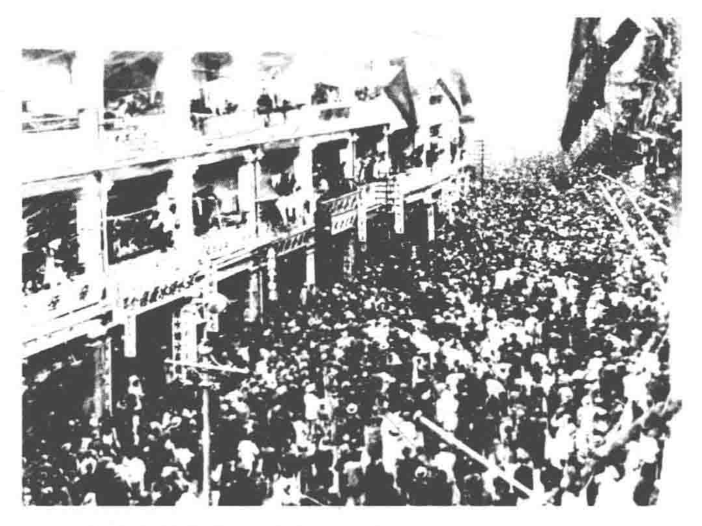
西方国家的革命模式而得出这种看法，但这个模式对中国革命是不适用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还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应当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工人运动的高潮和农民运动的初步开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因此，它敢于相信和依靠群众。党的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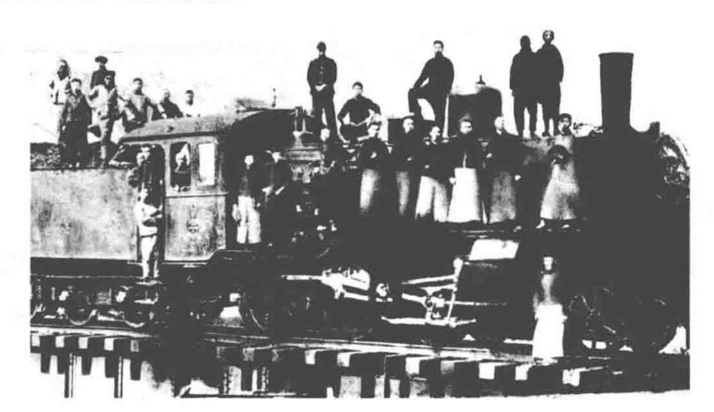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原设在上海，后来迁往北京，张国焘、邓中夏曾先后担任主任；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东、上海等地方分部。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党在工人中和整个社会上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实际上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并且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的议案，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后，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 香港海员和市民欢庆罢工胜利。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他们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克服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将罢工坚持了56天，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①]。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成员合影。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1930年6月19日)，《邓中夏全集》(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7页。

安源路矿（江西省萍乡县的安源煤矿和由煤矿通到湖南省株洲的铁路）共有工人1.7万余人。毛泽东曾来安源调查，随后由李立三来此开辟工作。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宣告成立。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接着，刘少奇也来此工作。9月14日，罢工开始，工人提出要求保障工人政治权利、改良工人待遇等17项条件。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所提的大部分条件，坚持了3天的安源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成员迅速由罢工前的700人发展到1万余人。

1922年10月23日开始，开滦煤矿（在河北省唐山一带）工人为增加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等举行罢工。拥有5万矿工的开滦煤矿罢工坚持了20多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等指挥了这场斗争。示威的工人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死数人，打伤50人。考虑到罢工旷日持久、难以坚持，在矿局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后，工人们接受有关方面的调停，忍痛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罗章龙等。京汉铁路总工会原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竟下令军方“制止



★ 林祥谦



★ 施洋

开会”。由于总工会会所遭破坏，代表寓所被包围，会议无法举行，总工会号召全路工人举行罢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2月4日，在长达2000余里的京汉铁路上，3万名工人在3小时内有条不紊地举行了总同盟罢工。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反动派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捆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复工令。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前来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京汉铁路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随后也在武昌被杀害。施洋牺牲前，身中三弹仍引吭三呼“劳工万岁”。在这次惨案中，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



★ 广东海丰县赤山约农会旧址。

由于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一些共产党员也开始到农村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27日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自己的家乡海丰县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

陆丰、惠阳三县的很多地方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1923年9月，湖南衡山县白果地区成立的岳北农工会及其所开展的斗争，树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旗帜。

1921年6月至7月，张太雷先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根据青年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负责对已停止活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922年5月，上海、北京等17个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约5000人。1922年5月5日至10日，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1921年8月，党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作为党的临时中央妇女机构。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1922年上海党组织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也开始得到加强。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工人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他们先后参加了党的队伍。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如安源路矿在1922年2月建立了党支部。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全国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95人。

这个时期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孙中山正是从这些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

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

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以后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①]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 年 2 月 2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合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6 页。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本章提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国共合作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猛烈高涨，给予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在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场革命遭到了失败。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群众发动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

这场革命的宗旨，正如当时群众普遍传唱的一首歌曲中所说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除军阀，是要推翻以北洋军阀为主的封建军阀的统治。所以大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共合作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欧美列强在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危机以后，在远东又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在中国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较顺利发展的条件又重新丧失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直接感受到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激起了反帝情绪的普遍高涨。第二，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卷入内战的军队，1917年约5.5万人，到1924年增加到45万人。军

费的激增，使人民担负的各种苛捐杂税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连年处于战乱中的省份，人民连生命财产的起码保障也无法得到。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阶层的强烈的共同需要。

这场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史称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的建立。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第一，这个党在中国社会上是有威信的。它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第二，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并且在这个地区举着国民革命的大旗，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进行活动。第三，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①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本来

① 1922 年，俄罗斯联邦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单独存在，实行平等的“党外合作”。另一种合作方式是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后一种方式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这年8月，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杭州开会，马林提出了这个建议。据陈独秀随后在党的三大上的介绍：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形式。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李大钊曾同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并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由此成为最早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党的三大的决定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

党的三大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

党的三大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李大钊在发言中虽曾提出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但未能形成大会的共识。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犯右倾错误的根子。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

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 孙中山等步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民

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①]。

大会否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跨党”的提案，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和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这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中，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周恩来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

①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2—113 页。

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①]。国民党内部情况虽依然相当复杂，但确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华人警察也参加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开展斗争。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自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向警予任主编的《妇女周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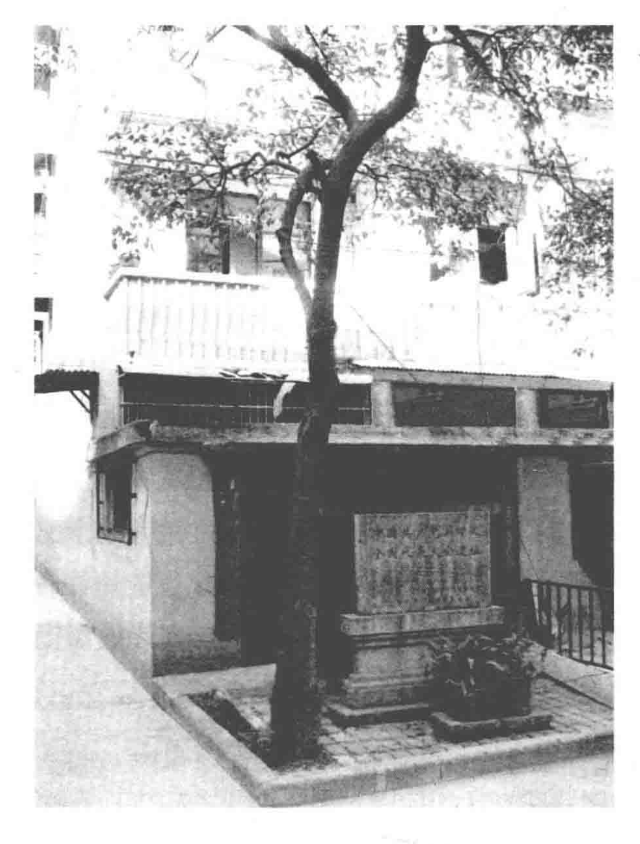
为了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所以通常被称为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这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徐象谦（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许继慎等。这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

①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 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2—113 页。

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年10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行，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国民会议，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的党员994人。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原会址房屋为临时租赁，会后交由中共中央工农部使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毁于侵华日军炮火）。

大会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

大会规定，有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这是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在组织上所做的一个准备。

党的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大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二、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是这样一个火种。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就是从这场罢工开始的。

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 顾正红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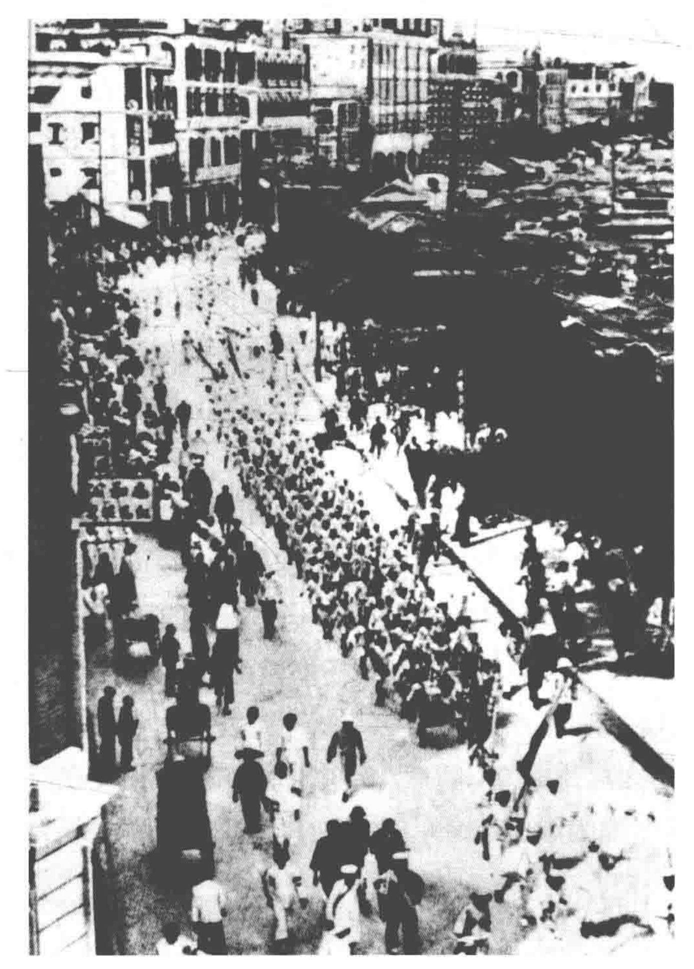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

构。6月1日，成立了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

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史称五卅运动。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19日，香港工人举行罢工。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



★ 1925年6月23日，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举行大游行。

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当场被打死52人，重伤170多人。这就是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封锁出海口，对罢工给予有力的支持。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由苏兆征担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实行封锁。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了16个月之久。10多万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这年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达到1万人，增加了10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①带领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反帝运动和革命斗争，团的组织和团员队伍也快速发展。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广东战争，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那时，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两年，但一直没有能控制广东全省。对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东江、敌视广州政府的陈炯明部。在广州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他们把持着广州市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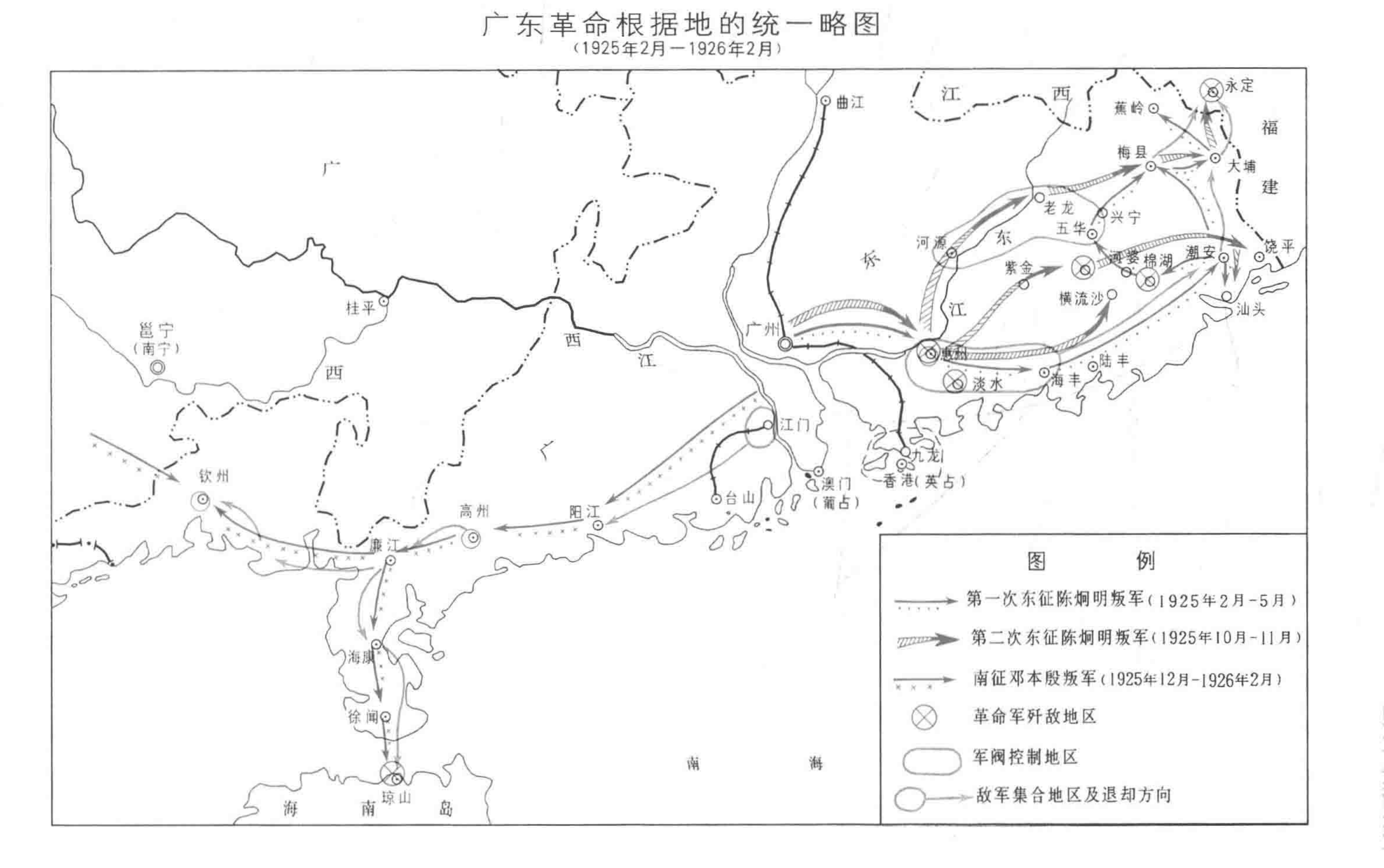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举兵进犯广州。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路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于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发动叛乱（即杨刘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平息了叛乱。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其中黄埔校军扩编为

---

①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略图
（1925年2月—1926年2月）



第一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担任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但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和其他旧军人手中。早在黄埔军校建立后不久，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以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把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改组为一支实际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1926年初，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但它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所占比重很小。从总体上来看，大革命时期党忽视了对军队指挥权的争取和掌握，这是当时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失误。

1925年9月，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得到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邓本殷部。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进行了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运动等。这些斗争，显示了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了控制北京的段祺瑞反动政府。

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限共、反共活动和共产党的退让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

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

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力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推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

1925年6月至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同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这对国共合作的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同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

对于戴季陶主义，对于西山会议派，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还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了“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和“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右派公开的反共活动。

严重的情况在于，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壮大起来、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但一定时期内在表面上曾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他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他需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同时，他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的发展，将妨碍他达到取代北洋军阀的目的。所以他即使在同共产党合作时，也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使人民力量不能独立地充分发展。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他的反

共活动便逐步加紧。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一时还难以识别。

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怎么办？不少共产党人认为，既然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新右派）已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那就必须进行恰当而有力的反击，遏制这种活动，来维护国共合作。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心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因而主张用妥协退让的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代表也持这种意见。这样，这种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等主张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在中央执委中使共产党员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当时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但是，“中央来电不同意”。结果，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人中，共产党员只有7人，比原计划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一共才14人，右派、中派却有15人。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得到了大大加强和提高。

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号军舰调动一事，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动：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

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对这种突然事变的到来，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其实，蒋介石那时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进行反击。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由蒋介石指挥，而且这个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中共中央当时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广州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中共中央于是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

一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苏联顾问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往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要求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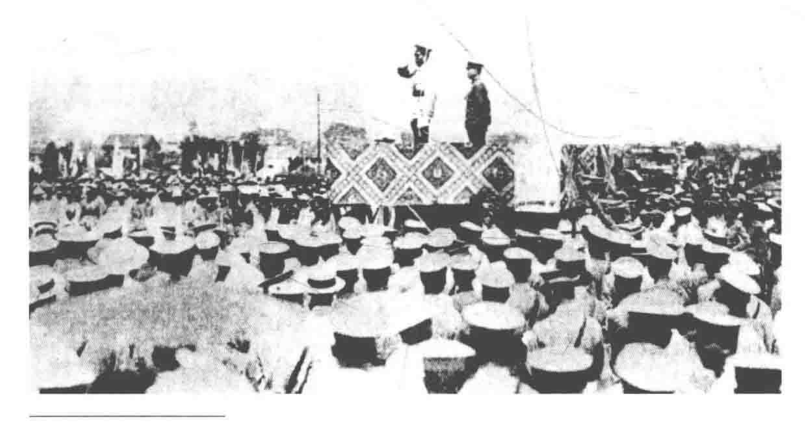
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从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却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人是会变的[1]。蒋介石已经公开地逐步地实行反共的步骤时，他们仍然把他视为中派，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破裂。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三个事件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接连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做了重要准备。以上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危机。

三、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与北伐战争胜利推



★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出师北伐誓师大会。

①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进同时，工农群众运动进入高潮，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和发展。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而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第二，他们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主要分为三支势力：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20万人；原属直系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军队20万人左右，此时已形成一支独立势力；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多万人。这三支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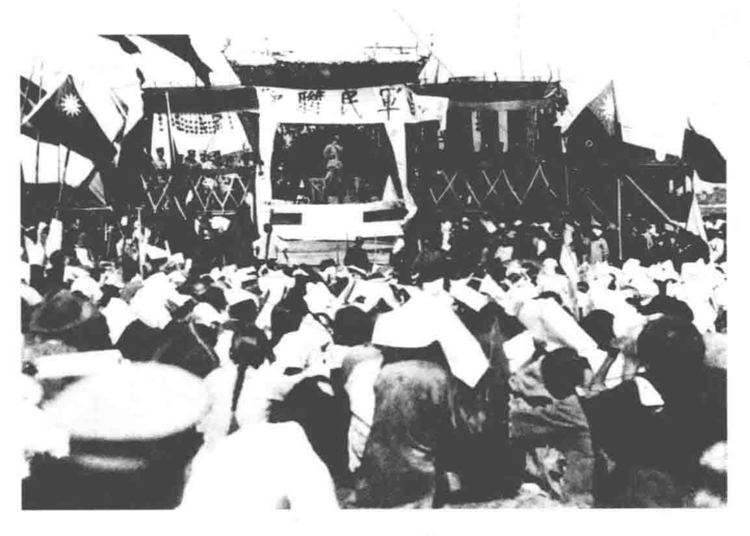
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方针，1926年5月，李宗仁统率的桂军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刚归顺国民革命军而正被吴佩孚部击败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正式开始后，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主力进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时，吴佩孚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到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9月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8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反扑，重新夺回南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于



★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举行军民联欢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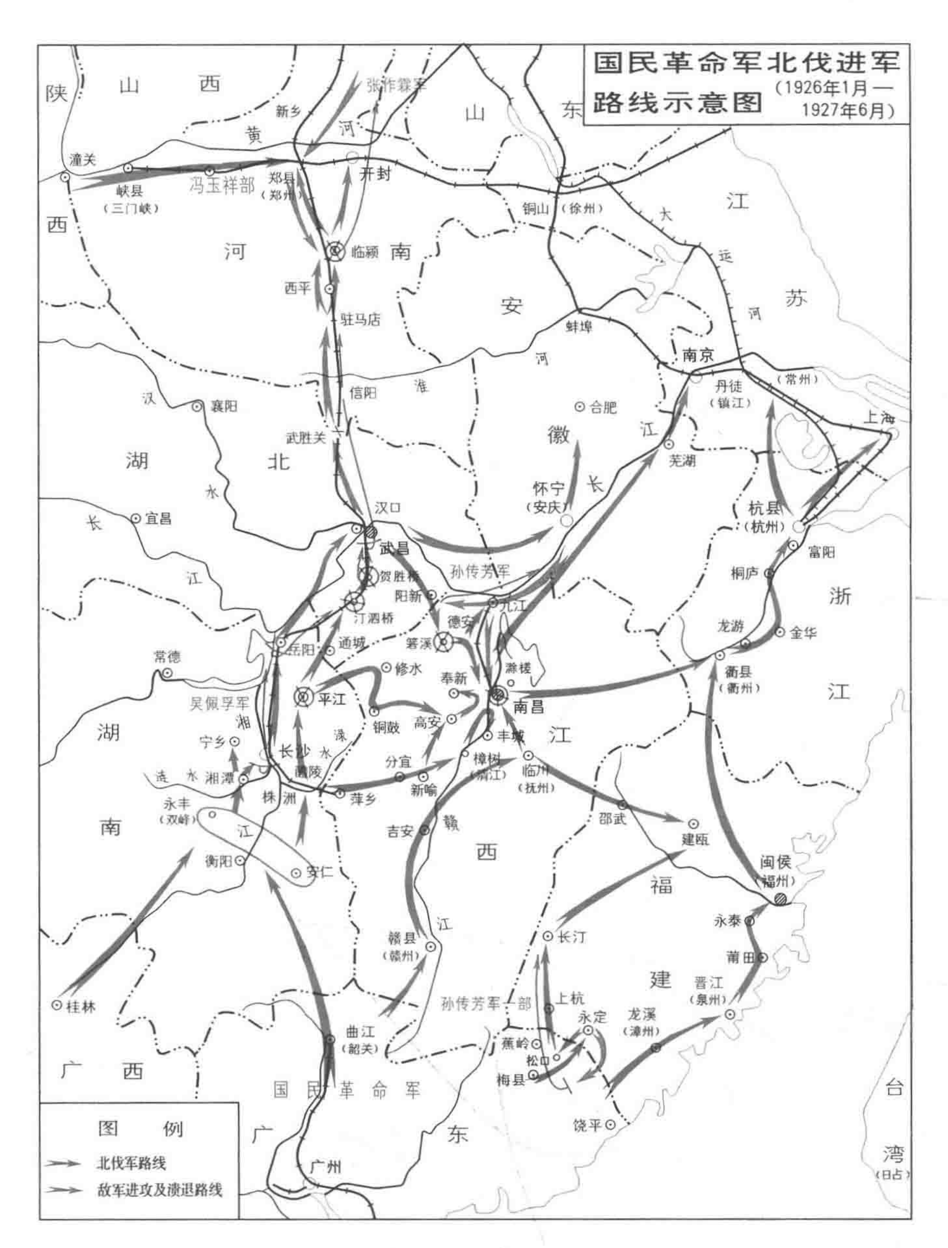
是，第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北伐军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到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然而，在北伐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蒋介石利用手中掌握着军事指挥权，大量收编北洋军阀部队，扩充自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本来，在北伐出师以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后来回忆，他到上海请示中央，向总书记陈独秀报告以后，陈独秀让张国焘主持开会商量，但开会时并没有真正讨论，只由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①]1926年9月，中央致函湖北省委，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1月，又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②]。在北伐过程中，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

①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 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4 页。

② 《李大钊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1926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60 页。



着重于民众运动，这是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加伦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战争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



★ 部分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南昌合影。前排右一为李富春、前排右二为朱克靖、前排右三为郭沫若、后排左三为林伯渠、后排左二为李一氓。

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



★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这个讲习所实际的主办者。

点。在湖南，从北伐军1926年夏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①]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间发展到20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5万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②]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但这些城市特别是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一些"左"的倾向，有些工人、店员的工资增加过快，工时减少过多，使部分中小工商业者无利可图，对有些中小工商业者还进行了过火的斗争。

在湘鄂赣等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续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奉（奉系军阀张作霖）倒段（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斗争。

1927年1月，由于英国水兵在汉口和九江登陆打死打伤中国人，武汉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2月19日和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署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



★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机关所在地——上海总工会。

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和准备不充分而遭到失败。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上海临时市政府虽然只存在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党的建设的推进和组织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的进行，特别是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思想、组织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进展。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还把“党的建设”问题列为专门一章。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初步进展。党对民主革命的目标、领导权、动力和革命对象等重大问题通过革命实践的探索，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党对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党提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中央机关和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的建设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扩大。

1923年党的三大在制定国共合作方针的同时，提出要“努力从

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的任务。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这次扩大会议前，中共中央设有职工运动委员会作为工作机构。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设立组织秘书、宣传报刊、宣传教育、工农、妇女、工会运动、出版等工作机构。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作为“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还决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出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大会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党的四大之后，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中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尤为出色，中共中央称赞“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

在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之后，19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入党；“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杂形式”；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会议还强调了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会后，党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级党校，用来培养党的干部。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据1927年3月统计，党员总数达到了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

0.5%、其他成分为4.2%。女党员占到党员总人数的10%[①]。党的队伍的壮大和自身建设的加强，推动了大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和会议代表人数表

时　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5年	1927年
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	中共二大	中共三大	中共四大	中共五大
全国党员人数	50多人	195人	420人	994人	57967人
出席大会代表人数	13人	12人	30多人	20人	82人

在大革命时期，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注意对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党的政策的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严守党的纪律的教育、反对和防止贪污腐化的教育等。党还大力加强宣传出版工作。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中央主办的政治机关报《向导》，1926年每期销量达到2.5万份左右。

大革命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

四、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失败

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归于溃

①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灭，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全然改观。

在北伐战争的前期，由于战争的前景尚不完全明朗，为了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和苏联援助以推倒北洋军阀，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羽翼已经丰满的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就开始日益公开化了。这种活动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

大革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国内外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它们积极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借故炮轰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多人伤亡的万县惨案。接着，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达到63艘，在上海集结的外国军队增加到2万多人，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总数达3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它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难避免，更着重对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工作，扶植新的代理人。它们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为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黄郛南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100万元。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他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

部的演讲中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6日，他指使国民革命军驻赣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由于国民党在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意由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这次全会否决了关于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且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了。但由于蒋介石这时掌握着主要的军事权力，单靠通过“提高党权”一类的决议已无济于事。蒋介石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他在16日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洪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打伤六人。接着，他乘军舰东下安庆。3月23日，他指使的暴徒就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并打伤多人。流氓暴徒们得意地说：“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在九江、安庆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在列举事实后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事实表明，蒋介石集团公开发动政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不能

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12月11日，周恩来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明确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他警告人们对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但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类看法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要求加以纠正。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说：“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会议根据报告所作的议决案认为：“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但决议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剧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它在实际上所强调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也就是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离开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所以，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为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苏联代表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所肯定，开始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并逐

步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陈独秀本人还直接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在东南一些省份，也出现了非难工农运动、否定工农运动主流的情况。

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错误方针进行了斗争。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3月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瞿秋白在这年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党在时局突变之前，又一次丢失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后的形势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则保证用流氓、暴徒组织及武装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

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在蒋介石正磨刀霍霍之际，仍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



★ 蒋介石下令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 就义前的李大钊。

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愤怒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全國濟難總會調查）

省名	被殺者	受傷者	被捕者	逃亡者	家屬入口
江蘇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
浙江	九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福建	五〇〇	二〇〇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四〇〇
廣東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
廣西	五〇〇	三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四五〇
湖南	二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湖北	一二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江西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四五〇
安徽	二〇〇	一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
四川	一二〇〇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	一二〇〇
雲南	八〇		三〇〇	一〇〇	八〇
貴州	五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五〇
山東	三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直隸	二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河南	五〇		六〇〇	八〇〇	五〇
山西	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	五〇
陝西	五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五〇
甘肅	五〇		二〇〇		五〇
東北諸省	一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
總計	二九四三〇	四三〇〇〇	二四九〇〇	三三二〇〇	二八二八〇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

七七

★ 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制《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国各省因革命而牺牲者的数目之统计表》，六个月中被杀者即近三万人。

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并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在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被击溃后，调兵南下。其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向南，抢占河南，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威胁。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情况也很复杂。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但骨子里认为当时“分共”虽“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①]。他同掌握这个地区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观望风向，随时可能从动摇到背叛。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面临的斗争任务比前一时期更加复杂。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

怎样对付武汉政权外的敌人，怎样对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要不要和能不能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然事变做好应付的准备，这都是迫在眉睫的考验党的重大问题。

危急形势下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在共产国际代表同苏联顾问之间、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两个尖锐的争论问题：一个是所谓深入和广出之争，一个是东征和北伐之争。所谓深入，就是以为现在革命应该深入，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所谓广出，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该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所谓东征，就是讨蒋；所谓北伐，就是进兵河南，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地点。

讨伐奉军。

鲍罗廷和陈独秀当时认为，武汉地区当时已是困难重重，必须向外发展；但如果向东南进攻，就会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发生冲突；如果实行土地革命，就会促使已处于严重动摇的武汉国民政府领袖们脱离革命而同蒋介石妥协；如果北上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联合，则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图东向。争论的结果，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这种“西北学说”和北伐讨奉的主张占了上风。这种主张，正同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决策相一致。4月19日，在武汉举行继续北伐的誓师大会，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陆续向河南进发。

“西北学说”的实质，是不敢采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允许的范围内，以此来稳定武汉国民党。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表现了对于人民力量的悲观和对敌人力量的恐惧。他们不是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而是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即同冯玉祥的会师上）[①]。在这种状况下举行的党的五大，自然难以制定出有效的挽救革命的方针和办法。

出席党的五大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了大会。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

①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象，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主张都是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的。

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这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去做好相应的准备。大会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革命原则，是正确的；但又提出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限制，并且强调没收地主土地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精卫等的同意，这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对这个问题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大会却大谈中国应立即准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即“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更是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这一错误。大会也未选举产生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陈独秀仍然担任总书记。

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从总体上来看，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而是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

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

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但这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急剧变化。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事态的这种发展，大大加快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伐。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紧急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虽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但这个指示是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革命当时有可能轻易取胜；而是说，采取这种果断措施之后，党将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也可以在早有戒备的状态中给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而不致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共中央认为，五月紧急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无原则的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随后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

“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所否定。7月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让步的表示，引起党内许多人的不满。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会议虽然同意部分农民武装可以“上山”，但对这项工作并未制订具体计划或采取相应措施去落实。其结果，不仅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取消，武汉的工人纠察队也宣布解散了。在当时革命形势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无原则的让步不但没有起到稳住武汉国民政府的作用，反而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将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同一天，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正指出，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

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场大革命，特别是广泛深入的工农运动，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这场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党由50多名党员曾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巨大的胜利。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很难在发动第一次冲击时就赢得最后的胜利。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拢和支持下，先后投入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这时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付如此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曾作出决议参加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共

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他们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不少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形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着直接影响。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质量。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了光荣的一页。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本章提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建发展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期间，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革命事业曾经遭受重大挫折。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一、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争斗，达成妥协，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实现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夺取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地盘。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途经皇姑屯时被日军密谋炸死。其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司令，于12月29日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样，北洋军阀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工农大众，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和革命的低潮

宁、汉合流之后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党。虽然它被反动集团所控制，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并且受到其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反动集团的领导。控制国民党的反动集团本身也不统一，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后，这个集团内

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及各地方的实力派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作出过承认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等让步，一时使人认为它似乎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国民党在形式上暂时统一了中国，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利措施，使不少人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产生幻想，以为中国可以从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之路。中国民族工商业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展。

不过，附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国民党政权没有也不可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多少发展空间。不久，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便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逐步形成为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不满，但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幻想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形式上的议会制度也不复存在。

由于国民党的军权控制在蒋介石集团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国民党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它的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内外债务和对外赔款的支付，财政窘迫，人民群众负担非常沉重。其次，从1928年起，

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其他异己分子，实行特务统治。再次，为了强化在乡村中的统治，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别设立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筹设”和交通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1934年12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最后，国民党还竭力查禁进步书刊，逮捕甚至杀害进步作家，解散进步团体，以此来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在对外方面，国民党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主张，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而对社会主义苏联则采取敌视政策，1927年12月宣布对苏绝交，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各领事馆。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 夏明翰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据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表现出坚决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共产主义信念的崇高精神。党的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状态。许多党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失望，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或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向敌人自首，出卖党的组织和党员。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沉。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

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似乎变得十分暗淡的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革命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和那些脱离党的不坚定分子相反，党外一些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真正革命者在这时加入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担任高中级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黑暗的中国，党勇敢地独立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工农群众逐步在党的旗帜下重新集合起来战斗。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

---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6 页。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汇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这次起义也有深刻教训。周恩来后来曾指出，南昌起义军“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①]。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 八七会议会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

① 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1972 年 6 月 10 日)，记录稿。

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次要的，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起义军最初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这时，毛泽东果断地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些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经过三湾改编，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



★ 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1937年在延安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

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①]

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先后和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共产党员）、王佐两部建立联系，又派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中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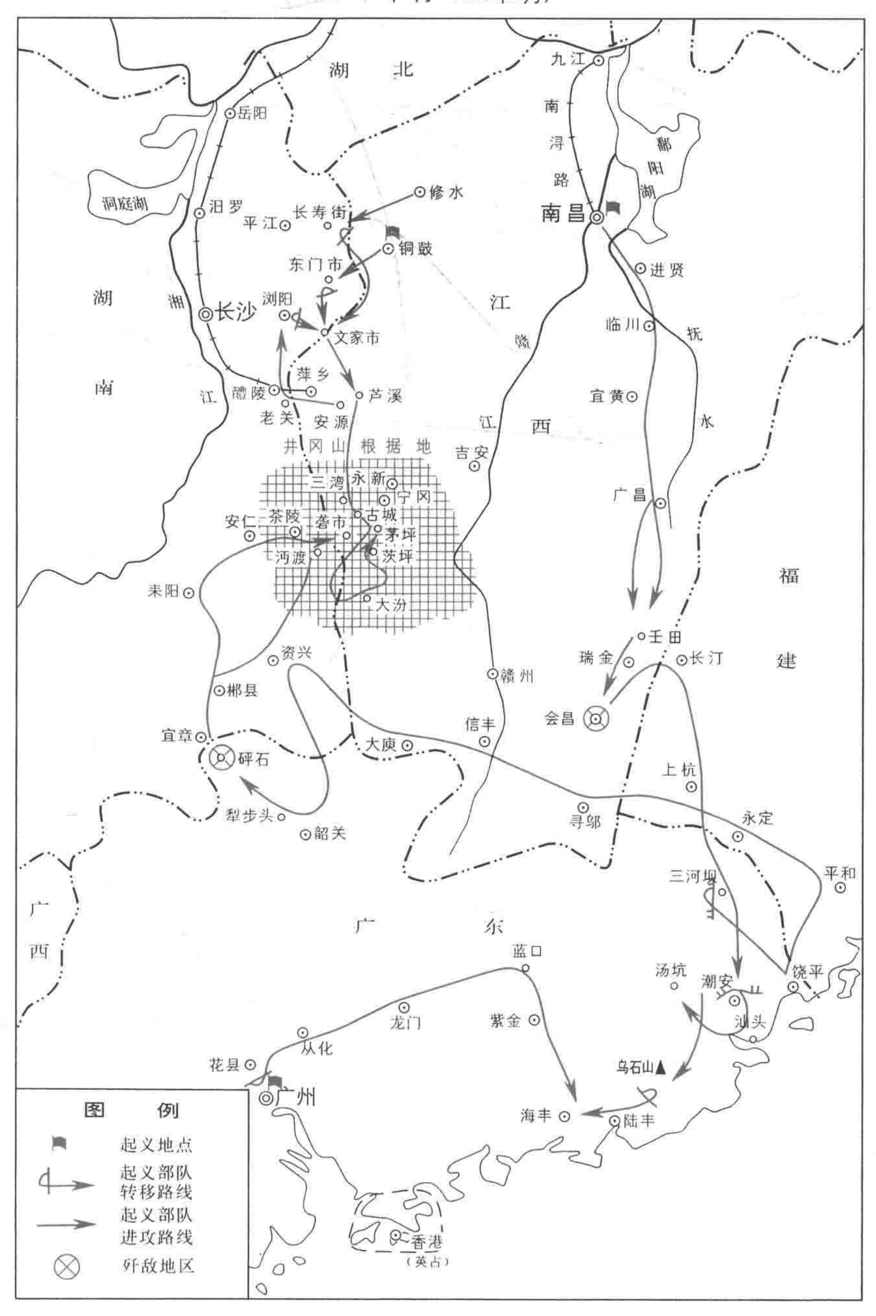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参与了对起义的指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后，乘国民党军主力外调的机会，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②]政府，颁布了维护工农权益的法令。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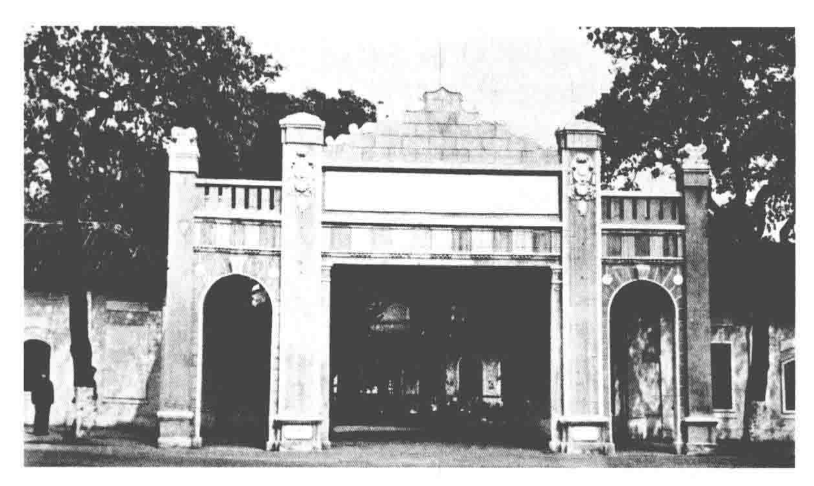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②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音译，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

南昌、秋收（湘赣边）、广州起义及向井冈山进军示意图

（1927年8月—1928年4月）





★ 广州起义指挥部旧址。

殊，无力坚守广州，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主张趁敌人主力尚未开回广州前将起义部队撤出，这个正确主张遭到诺伊曼反对。起义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在起义的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又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党还在一些省份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

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结果失败了。但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了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在各地举行的一系列起义，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

重要性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①]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认清形势，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损失，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时期而党内却出现"左"倾盲动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的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怒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7年11月党内出现"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

---

① 毛泽东：《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页。

确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召开新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1928年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斯大林的看法，对中共六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所做的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的情绪，实现有关认识和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为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把曾为武汉码头工人、但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的向忠发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是受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事实上，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党的六大也有不足，主要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仍然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应对政策。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二、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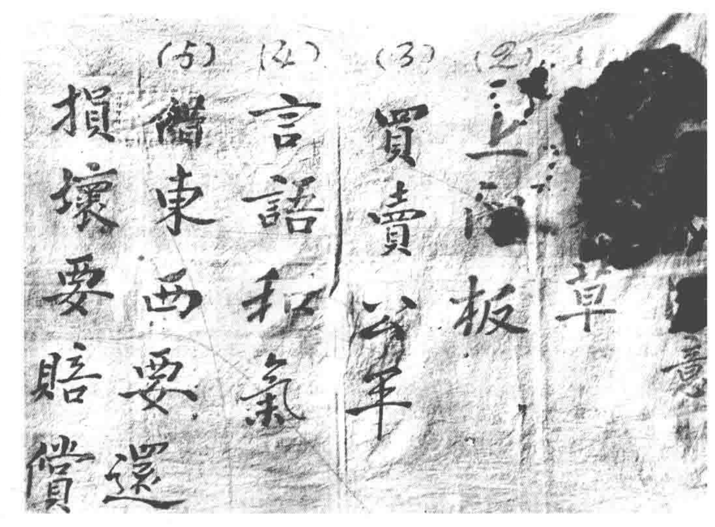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向赣南闽西进军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时，决定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当地的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粮；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部和唐生智部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这是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良机。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十分重视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派出骨干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



★ 1928年红军战士写在包袱上的“六项注意”。

党的组织。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他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当时称“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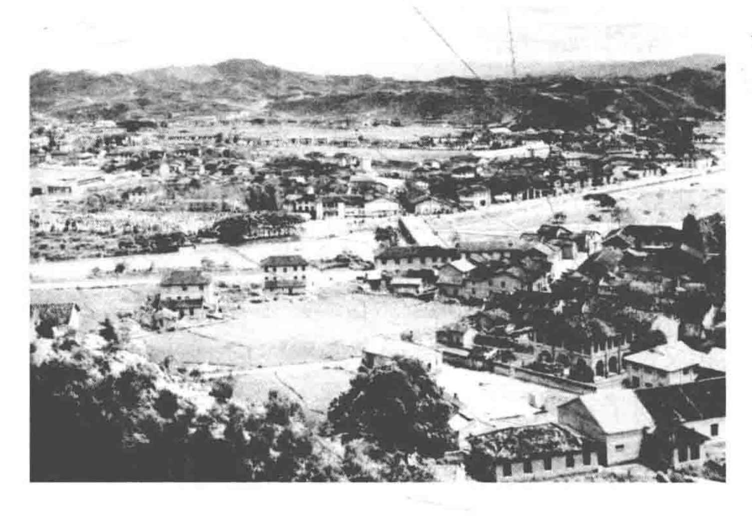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密切关注南昌起义部队。1927年10月初，他派何长工前往打听南昌起义军下落。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何长工终于在韶关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朱德听何长工介绍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后，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并告诉何长工，前不久已派毛泽东的

弟弟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去了。第二天，朱德送别何长工，要他赶快回到井冈山同毛泽东联系，并告知他们正在准备发动湘南起义。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接着，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

这时，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连续发动"进剿"。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在这一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连续打破国民党军第二、三、四次"进剿"，使根



★ 江西宁冈砻市旧景。

据地日益扩大。在6月23日红四军取得了龙源口战斗胜利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顺利发展之际，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巡视员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报告湖南省委，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意见。

7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杜修经不顾联席会议决定，引导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使红四军主力和井冈山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史称八月失败。留守井冈山的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英勇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人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慌忙命令部队撤退。敌人第一次“会剿”草草收场。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的大部分地区，粉碎了敌军发动的第二次“会剿”，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杨开明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因病，由谭震林继任）。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主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在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地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

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①]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会剿"后，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新的发展。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三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进入赣南后，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0日，红四军将尾追之敌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至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关键的一战。战斗到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着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战至11日下午，红四军消灭尾追之敌大部，取得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

2月17日，红四军到达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这时，毛泽东、朱德等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已被敌人占领，遂于2月下旬率领红四军经广昌、石城向闽赣边界挺进。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境内，于14日在长汀县长岭寨全歼地方军阀

①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 页。

郭凤鸣旅，乘胜占领县城。20日，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①

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并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会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2月7日的来信（即二月来信）。这个指示信根据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5日，红四军前委复信中央，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红四军利用蒋桂战争的有利时机，在赣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在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后，红四军乘福建军阀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当地工农武装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先后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古田会议与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8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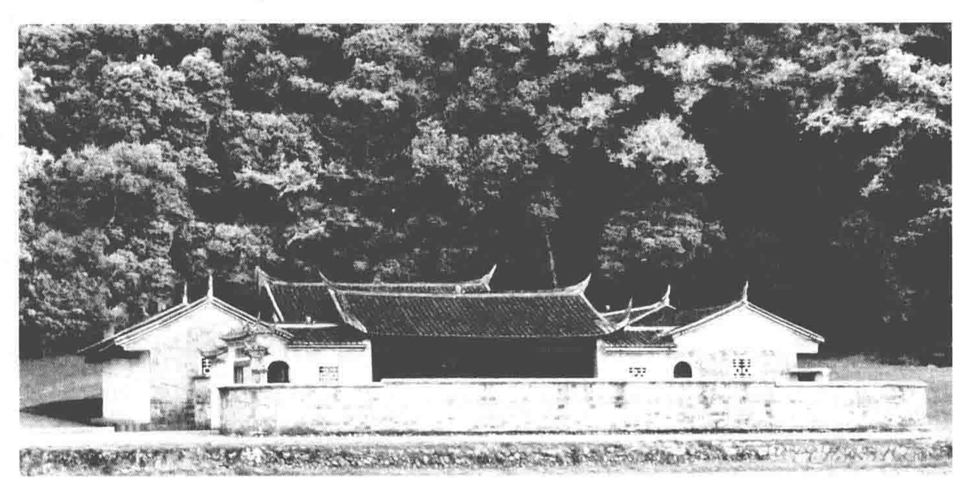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这就是古田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信。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等思想倾向。决议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以后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党员的条件是：(1)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 忠实。(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 没



★ 古田会议会址。

有发洋财的观念。(5) 不吃鸦片，不赌博。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个问题，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加以解决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革命力量超过反革命力量时占领城市的经验。因此，革命工作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首先是为了占领中心城市，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大革命已经失败，中共中央仍然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

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多经过摸索，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迫使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党的六大和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虽然仍以城市为工作中心，但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红军在农村的斗争发展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①]。1930年4月，周恩来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这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同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的署名周子敬的来信，明确提出党应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在这条道路的开辟过程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3 页。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①]中，在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②]中，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不过，这时毛泽东还未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在稍后的继续探索中明确起来的。

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③]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② 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③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新的中央路线问题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邓小平后来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三、革命走向复兴时的“左”倾错误的纠正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了。

革命的复兴和“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的局面，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南京国民政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府建立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就是原来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人们，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起来。自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起，国民党新军阀之间重新陷入连年不断的混战，许多原来围攻工农红军的军队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战场，造成后方空虚，给了各地红军以发展的机会。主观方面的原因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比较能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根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精神，党的六大以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的转变。中共中央着重纠正那种只依靠少数人拼命、不顾一切地蛮干的“左”倾盲动的指导；注意纠正党同群众之间严重的隔离状态，强调必须深入群众，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党的干部要充分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

在努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同时，党又坚决地同右倾的主张和行为作斗争。那时，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取得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他们取消革命运动，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所谓“流寇运动”。在党提出批评后，他们不但拒不接受，而且秘密成立反党的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这种分裂活动是十分危险的。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并批准将彭述之等开除出党。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所做的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建立红军，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十万人。

这时，除了毛泽东、朱德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党开辟的主

要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和琼崖等。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革命武装，当年7月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并建立了鄂豫边根据地、豫东南根据地、皖西根据地。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派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一地区后，1930年6月，与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 红七军印发的布告。

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还以很大力量加强党的建设。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改组、重建和充实很多屡遭白色恐怖破坏的地方党组织。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增加到6.93万余人。到1930年9月，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为了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的恢复，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还决定加强对已有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专业机构的领导。早在1927年5月，时任中央军事部[①]部长的周恩来在汉口创立了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之后在此基础上，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情报、保卫工作的决策机构，代表党中央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样，经过两年来的艰苦努力，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六大时相比，有了明显好转。然而，当革命形势刚刚好转时，1930年夏，“左”倾急性病在党内又逐渐发展起来。

1929年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这些指示信的精神都是反“右”，特别是在10月26日的信中，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

① 又称中央军人部。

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指示信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提出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武装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左”倾冒险错误的重要原因。

促使党内“左”倾冒险错误急剧升温的另一原因，是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30年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也给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但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并没有改变。

这时，周恩来已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形势”，并“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据此，决议认为群众已经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决议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对中心城市实行大规模进攻战。

决议还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

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8月6日，李立三等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机关，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1930年6月至9月），但使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组织暴动而把原先积蓄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几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受到不同程度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在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遭到压制和打击。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6月间接到党中央要他们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于8月初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实际力量对比，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不仅兵力没有减少，而且由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发展到1.8万人。这时，奉命攻下长沙的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他们奉命再攻长沙不克。毛泽东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部队也发展至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

错误有所抵制。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这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会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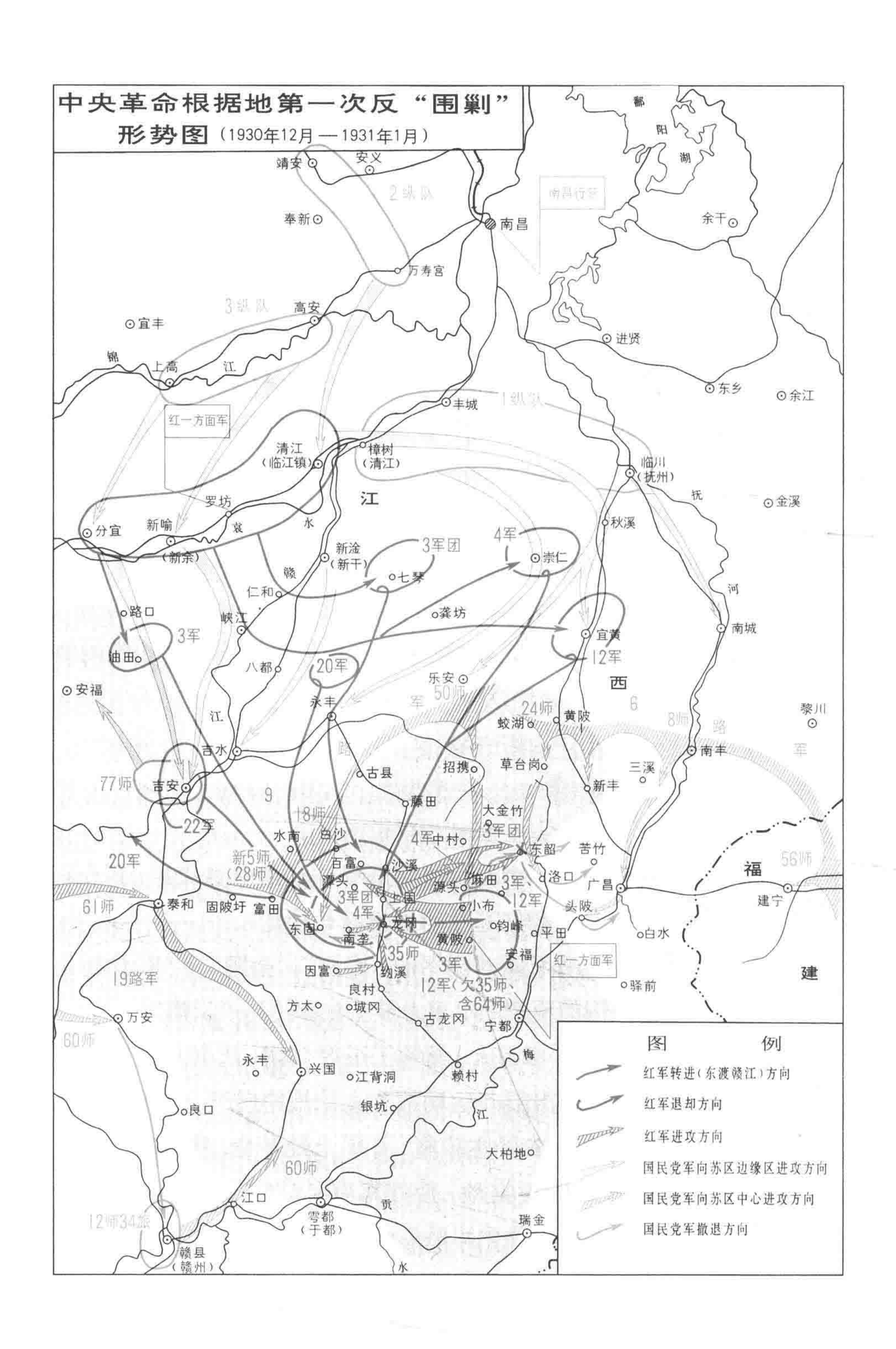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不足之处是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并错误地批评了曾经正确反对李立三错误的何孟雄等人。但总的说来，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已得到纠正，党的整个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

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军阀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这时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

这时红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组建了正规兵团，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因而有可能实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红军所到之处已普遍建立党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建立起较大块的根据地，使红军有了广阔的战场和回旋余地。这些都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不曾有过的有利条件。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形势图（1930年12月—1931年1月）
图例
红军转进（东渡赣江）方向
红军退却方向
红军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向苏区边缘区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向苏区中心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撤退方向
南昌
鄱阳湖
红一方面军
清江（临江镇）
樟树（清江）
临川（抚州）
新淦（新干）
吉安
吉水
泰和
永丰
宜黄
崇仁
东韶
龙冈
宁都
兴国
赣县（赣州）
雩都（于都）
瑞金
广昌
南丰
建宁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①]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多人，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拥有4万多人。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敌情，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近1万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龙冈、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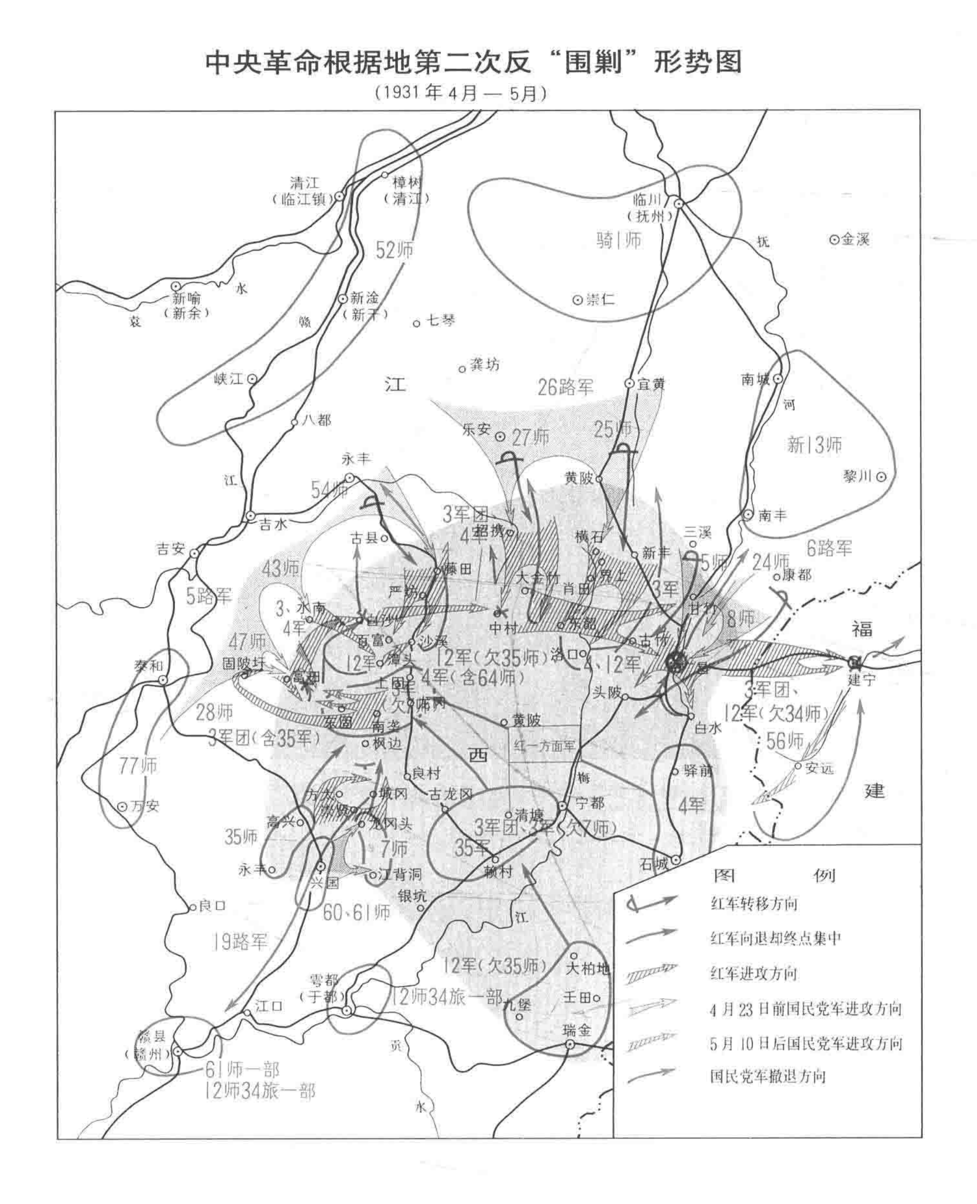
★ 1931年1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央派来的项英任代理书记；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

①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这里。此后，人们把赣南、闽西根据地亦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不久，蒋介石又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形势图

（1931年4月—5月）

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刚散，蒋介石便在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经过历时3个月的作战，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被粉碎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是重大的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部西北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是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十六路军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三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与此同时及稍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经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国民党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形势图（一九三一年七月—九月）

图例
红军反攻第1阶段进攻方向
红军西移和佯动方向
红军反攻第2阶段进攻方向
7月初—8月初国民党军进攻方向
8月上旬国民党军向君埠及向西开进方向



★ 行军中的红军队伍。

军队的“围剿”，是由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胜利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是分不开的。红军作战的原则主要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在这个过程中，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相结合，使主力红军的战争与人民的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这些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才逐步形成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

①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0—244 页。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即迅速开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会后，在闽西300多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分田，6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批评了一些地区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批评了一些地区按耕作能力和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会后，兴国等六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也全面开展分田运动。次年2月，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田地分给农民后，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可以租赁买卖，田中收获除给政府交土地税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又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在政府而不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

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



★ 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的土地分配证、分田证、耕田证。

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列举了贫农在12个方面得到的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了。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费用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他还写到，过去中农在政治上处于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这样，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纷纷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如江西兴国，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16岁至23岁的参加少年先锋队；8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务是“放哨”“检查烟赌”“破除迷信打菩萨”。翻身农民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香烟等物品慰劳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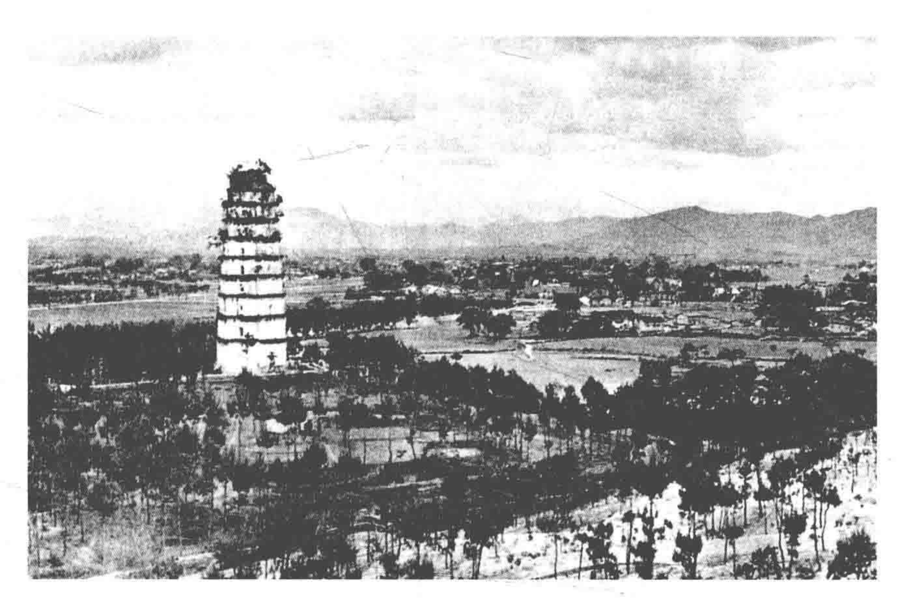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社会各阶

级及其政治代表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是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则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国民党有时口头上也讲“耕者有其田”，但根本没有实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关键就在于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



★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

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根据这个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新成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开展财政预决算审查、国家企业和群众团体财政收支检查、节省运动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维埃政府重视司法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仅在中央根据地，就有2000余名干部从事司法工作。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许多青壮年参军参战、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需商品。此外，根据地在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发展。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文盲众多，是旧中国广大农村的共同特点。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养成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于中央根据地的民歌，真切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赞誉。

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

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四、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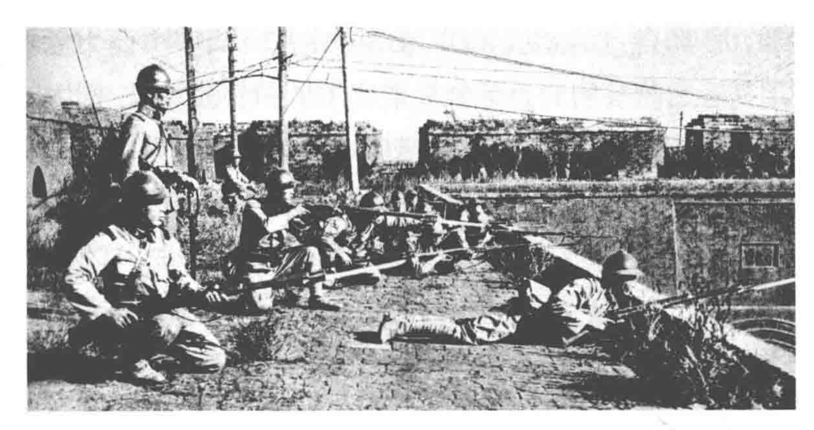
正当蒋介石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一直抱着独霸东亚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严重步骤。

广大中国民众痛感亡国惨祸已迫在眉睫，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1894—1895年，它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继而又通过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设立关东都督府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1927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力图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并决心为之诉诸武力。会后，传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

1929年秋，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国内阶级矛盾



★ 1931年9月19日，日本军队在沈阳小西门城墙上向城内射击。

日益激化。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危机带来的困难。日本政府和关东军下决心制造事端，武装夺取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第二天，日军便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在短短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日本还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中国民众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以请愿、募捐、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4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前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11月末，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

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武力阻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海外侨团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一致抗日，表示誓为后盾。

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全国人民对坚持在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抗日斗争给以热烈声援。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在7月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调停上。但是，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束手无策。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中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国民党政府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参战。但它的基本方针仍然是求和。经过英、美等国的调停，南京政府于5月5日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又同日军签订了出卖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强行解散。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

① 《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


★ 赵一曼

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中共党内又产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

1930年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王明①等人通过其他渠道先于中共中央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王明还散发他写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现阶段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

① 本名陈绍禹，1931年底采用王明这一笔名。后来党的文件和党史著作均习惯地称陈绍禹为王明。

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们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他们的言论和活动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在这种混乱状况下，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已难以正常工作。

10月，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米夫①到达上海。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驻上海的远东局，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改变中共中央领导，贯彻共产国际路线。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同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等

① 米夫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对曾在该校学习和工作过的王明器重有加。米夫到任后，支持王明等人的要求，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共产国际。

人脱离实际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失去清醒认识和抵制能力。这种状况，反映了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王明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倒是"右倾"，是"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推行"进攻路线"。整个来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上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的情况。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1931年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幸而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千方百计找到陈赓，并由陈赓转报党中央。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沉着果断地采取措施，转移各机关人员，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不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自由行动，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

同年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

局（即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叛变）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表明，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但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主要是：

他们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个口号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接受。

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统治的，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加以打击。

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强调要实行"进攻路线"，作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错误判断。

他们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要求上海等地"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重要干部如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和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铁夫等的批评和抵制。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应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并在党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他们的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指责为犯有"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被撤销领导职务。在革命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等的反对和抵制。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活动本来就极为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境遇变得更加困难。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河北省委接连遭到3次大破坏。全国赤色工会的会员，到1932年1月只剩下3000人。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6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被破坏殆尽。

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中一些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指导思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在客观现实的教育下，不少党员以至有些党组织，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它的某些束缚，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灵活有效的做法。当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和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后，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一些在上海的党组织，如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后来成立的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等，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独立进行探索，使党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开始注意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和尽量利用各种合法阵地开展工作。在临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中，也多少出现这种变化的征兆。张闻天1932年11月在党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上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强调要反对左翼文艺运动中的

“左”倾关门主义，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建立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筹划下，1930年3月，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一些共产党员同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宋庆龄在1931年6月从欧洲归国后，立刻投入营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人员牛兰的活动。她痛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并于12月19日在上海发表宣言，公开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她先后发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

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也同党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写了大量杂文，



★ 1932年冬，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

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他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左”的倾向。1930年3月，他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毛泽东说过：“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时，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就是共产党人对《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帮助。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生活》周刊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达到十多万份。邹韬奋的言论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1932年7月，邹韬奋又创办生活书店，出版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

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六年时间内，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傅东华等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通过明星、联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一大

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中的主题歌。这首歌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他们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论战，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批驳了违反或歪曲中国实际国情的种种错误观点。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愈来愈注意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用青年人易于接受的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

当时的左联、社联等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以这些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留在上海，他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

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此后，毛泽东的处境日渐困难。

1932年5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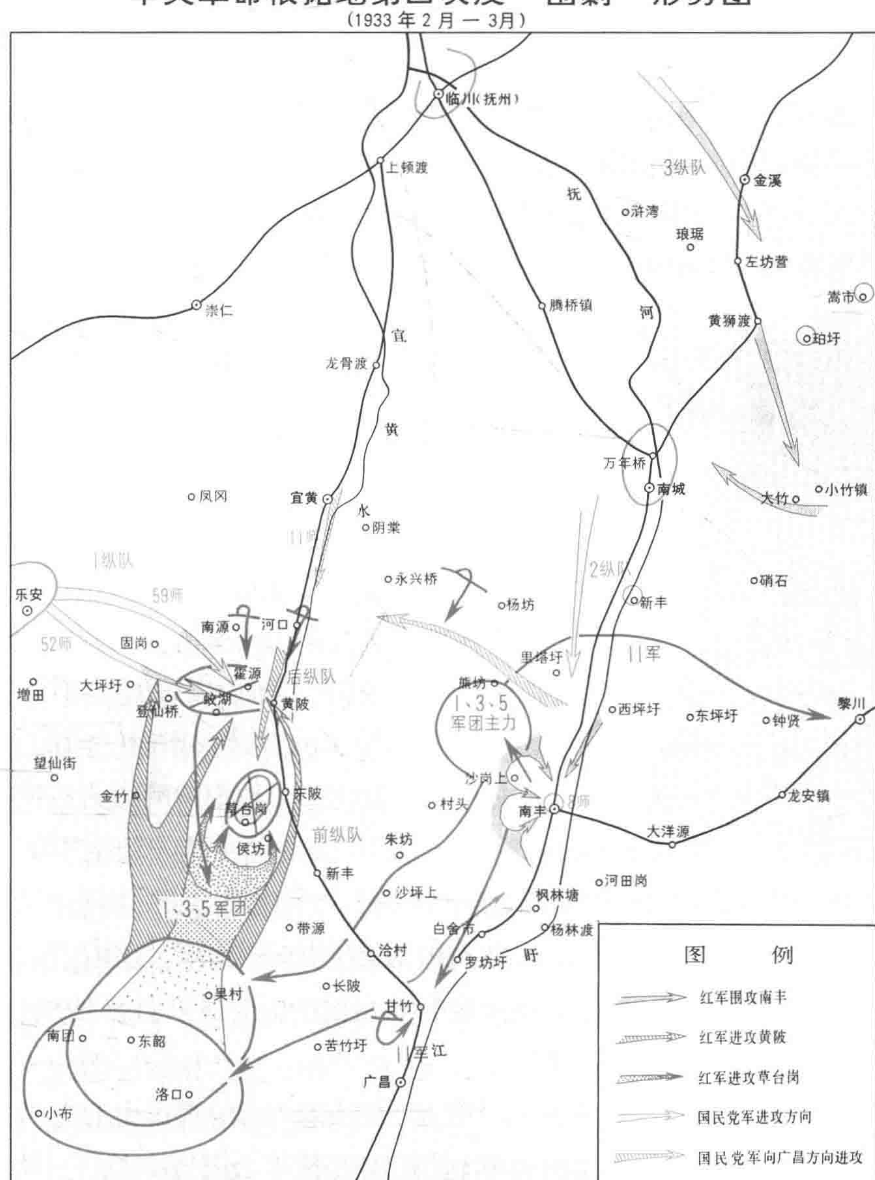
7月14日，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有4.5万余人，如采取正确方针，是能够打破敌人“围剿”的。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排除异己，在“肃反”中错误杀害了许继慎等大批优秀干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他又盲目轻敌，结果使红军数战不利，处于被动地位。张国焘在未得中央允许的情况下，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历时2个多月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十余万人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去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夏曦，同样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干部。在作战中，夏曦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只得退出根据地（夏曦后来在长征中牺牲）。经过长期转战，红三军开辟了黔东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约有7万人。这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1933年二三月间，经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俘敌1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

（1933 年 2 月 — 3月）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他们一进根据地，便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一些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看作“机会主义者”，对他们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和时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等，根据实际情况，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已有八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当时出现过一次红军粉碎“围剿”的有利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于11月22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定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但

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在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把“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5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了红军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情况下的两个方案：（一）留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二）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


★ 方志敏在狱中。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红七军团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牺牲。

1934年7月下旬，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奉命撤出湘赣根据地西进。红六军团的西进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

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后，红二、红六军团统一行动，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中央根据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丢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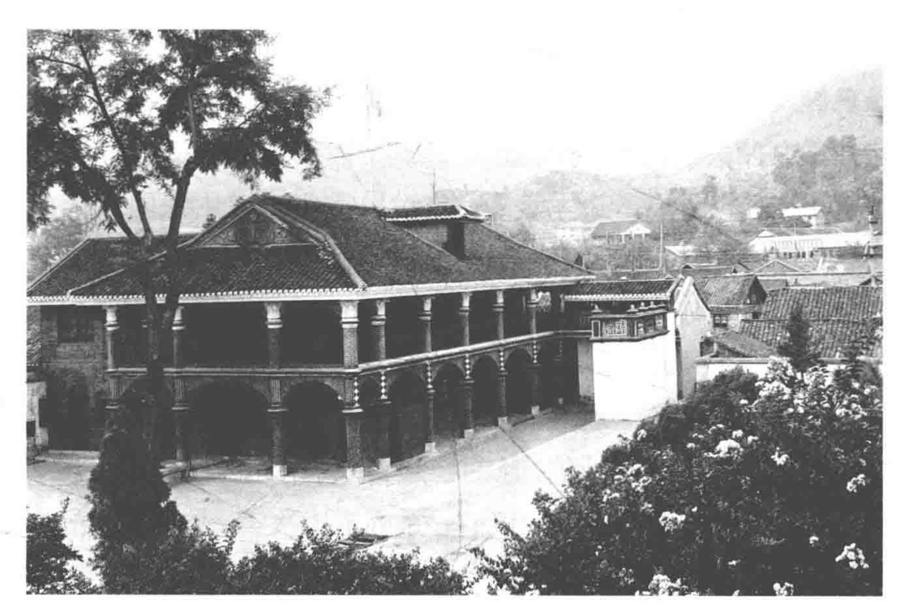
“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重失败的考验。在险境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 遵义会议会址。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

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①]，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

---

① 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事宜，曾在1934年夏成立过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动。从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军北上，一、二、四方面军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从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待创建的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据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



★ 红军长征途中翻过的雪山——夹金山。

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微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先后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①]和军委纵队

① 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称红一、三、五、三十二军。



★ 红军长征走过的荒无人烟的水草地。

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

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1935年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兵力减半，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国的张浩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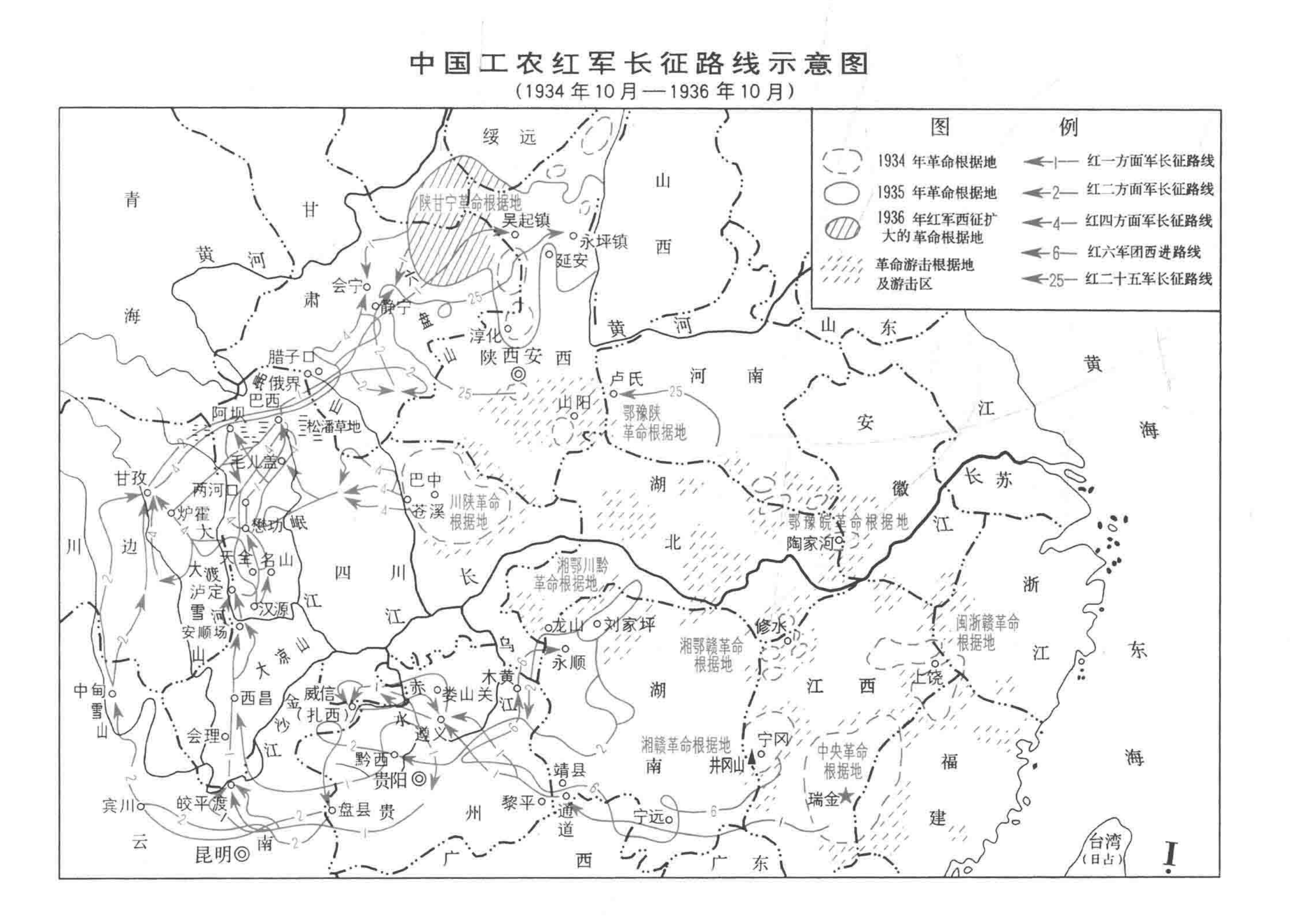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1]



★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右起）。

各路红军长征起止时间、经过省份及行军里程累计表

部队名称	长征起止时间	长征经过省份（包括出发和到达省份）	长征行军里程累计
红一方面军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	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	2.5万里

① 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4 页。

（续表）

部队名称	长征起止时间	长征经过省份（包括出发和到达省份）	长征行军里程累计
红二方面军	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	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	2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	1935年3月至1936年10月	四川、西康、青海、甘肃	1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	河南、湖北、甘肃、陕西	近1万里
总　计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	6.5万余里

注：表中省份是按长征发生当年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按现今行政区划，红军长征经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计为15个，即：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

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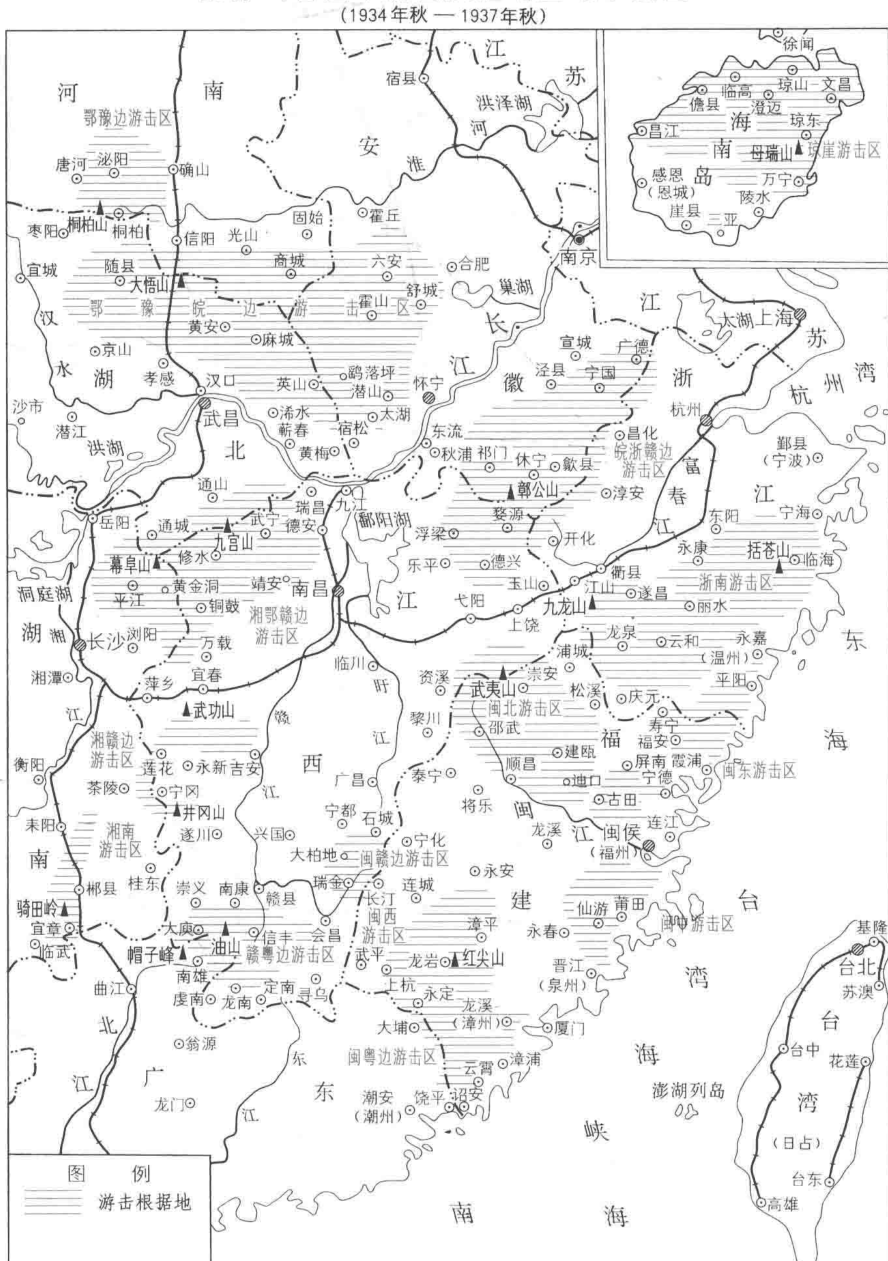
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在策应、掩护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进行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众寡悬殊，也遭受重大损失。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面对着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项英、陈毅等曾被困赣粤两省交界的梅岭多日，时时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当时，陈毅写下了感人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现出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尚情操。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曾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一部，在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4年秋—1937年秋）



海南岛进行抗日斗争）。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中共满洲省委认真贯彻指示信精神，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关门主义，改善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从1933年9月起，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6年2月，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 杨靖宇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活跃在东南满地区的有第一军和第二军。1936年7月，第一军和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活跃在北满地区的有第三军、第四军和第六军。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第五军主力。1936年11月，以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抗日联军第七军。

除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联军七个军外，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

抗日联军11个军，共3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侵略者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但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不可能不造成全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热潮。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中旬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北平、天津和河北。在此之前，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逼迫国民党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上述两个协定实际上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它的第二个步骤是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10月间，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

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6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出兵占领河北和山东。11月下旬，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作为适应日本要求的妥协办法，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

华北事变使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李常青和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的组织、指挥下，12月9日，北平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向北平当局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增加到3000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棍棒从两侧袭击学生。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 游行学生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搏斗。

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行动。许多地方的工人也进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次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后来很快发展到两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先进的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0月1日，宣言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这时，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不久，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即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军事战略问题。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以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充分地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

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春，刘少奇抵达天津后，向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恢复、整顿和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青年的爱国运动。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成效。

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

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接办、改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将其发展成为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已超出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国共双方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5月5日，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全部回师河西时，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这时，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虽有变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心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



★ 1936年2月东渡黄河前的红军部队。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争取中華民族生存
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
通電全國發表救國主張八項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卅萬民衆歡騰鼓舞擁護民族解放運動
救亡領袖
張學良將軍
救亡領袖
楊虎城將軍
張楊等通電全國
發表救國主張
西安各救

★《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前没有与闻。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应该支持。张闻天在发言中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作结论时强调，不应把反蒋与抗日并立。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表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

起了促进这个合作的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毛泽东指出：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是为了团结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李烈钧以及孙科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为了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



★ 1937年4月2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等到机场欢迎。左四起：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总结历史经验，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同时，还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中奋斗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犯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从事理论建设的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样，就开始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党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经过曲折的斗争，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紧紧依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

这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在

这个时期，党内盛行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正是由此走上了复兴和胜利发展的道路。

这十年的历史还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总结人民斗争的成功经验，而且善于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因而在这个时期，它能够有效应对危局和困境，实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样两次历史性的转变，把中国革命继续不断地推向新的阶段。



第四章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本章提要

*1937*年至*1945*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总体上是在以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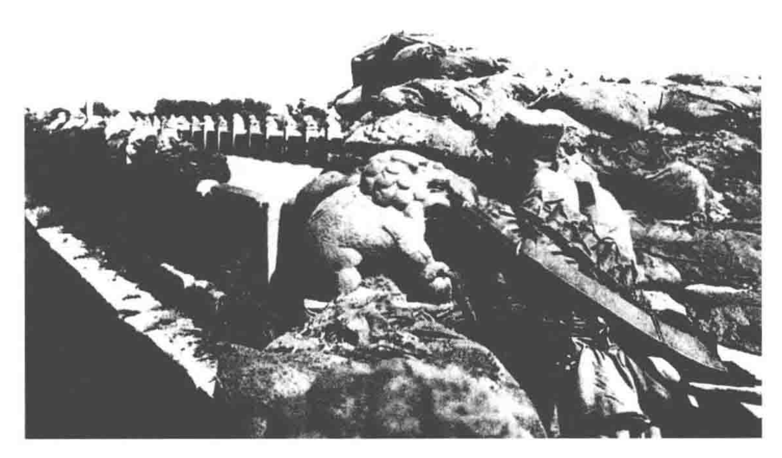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国性抗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日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时间是三个月。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



★ 守卫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士兵。

计。”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接着，派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停止实行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等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北平居民自动帮助挖战壕、抬担架，妇女为官兵蒸馒头、洗衣服，长辛店的工人为修筑工事把大批铁轨、枕木

送往前线，农民为部队出粮、出工，甚至六七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战刀。上海各界群众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参加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支援前线。武汉、四川等地的抗日救亡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全国舆论界群情激愤，各地大小报刊抗战呼声四起。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拒绝。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双方达成将在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



★ 红军改编誓师大会。

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林彪和聂荣臻、贺龙和萧克、刘伯承和徐向前分任正、副师长，全军约4.6万人。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八路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新的统一序列，将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但人们仍习惯地把它称为八路军。同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接着，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陈毅和傅秋涛、张鼎丞和粟裕、张云逸和谭震林分任第一、



★ 新四军第二支队召开抗日誓师大会。

第二、第三支队正、副司令员，高敬亭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全军共1.03万余人。随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同意联共抗日，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对国家民族的有功之举。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200万军队。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也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内地。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华侨为抗战捐款累计逾13亿元（法币，下同），侨汇达95亿元以上，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以上，总计占抗战期间中国军费很大的比例。在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正如爱国作家郁达夫所称："中国若果是一只睡狮的话，现在已经在张眼睛，振精神，预备怒吼了。"

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

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围绕着抗日战争，国内外形势仍然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在国际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力量。意、德法西斯相继支持日本侵华。英、法、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和中国均采取两面政策。它们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资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企图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牺牲中国部分权益，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成为第一支来华参战的国际援军。在三年多的对日作战中，200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国内，全国人民坚决主张抗战。不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不少人，特别是由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也站在抗日方面。但很多人对如何抗战还不清楚，对共产党一时缺乏了解。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但又不满其腐败和专制。在国民党内，有赞成抗日的民主分子，也有暗藏的汉奸，掌握实权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他们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于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广泛动员和组织，将损害自身的统治地位。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

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少限制。同时，国民党还总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援助上。然而，不发动和依靠群众，抗战的坚持和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它确信，中国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是利用了中国群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我们就有了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所以，必须充分地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

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①。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

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正如会后不久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②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十大纲领的主要

---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一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会议还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主要是：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等等。

会议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负责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盲目轻敌的思想。

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并且相信中国将最后胜利的人很多。可他们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不同。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论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中共中央就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



★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

战争。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经验，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

《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在讲演中指明了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分析了战争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进而指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

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讲演和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基本认识是：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展开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沦陷区大量民众得到解放，并且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止日军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特别要担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正规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

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

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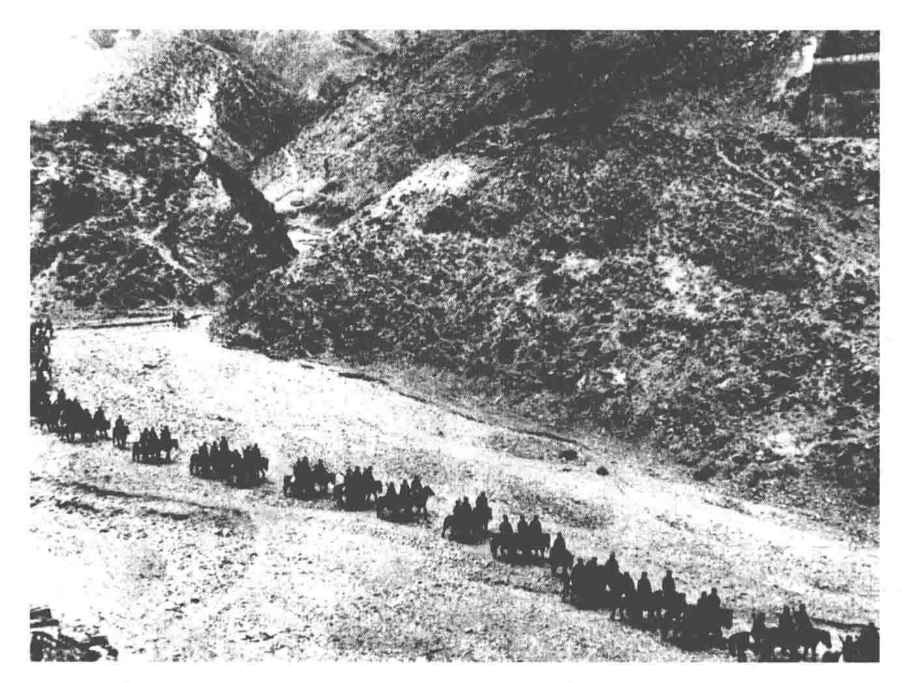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并迅速壮大起来。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难。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规定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的锐气并掩护友军退却；另一方面伺机深入敌人占领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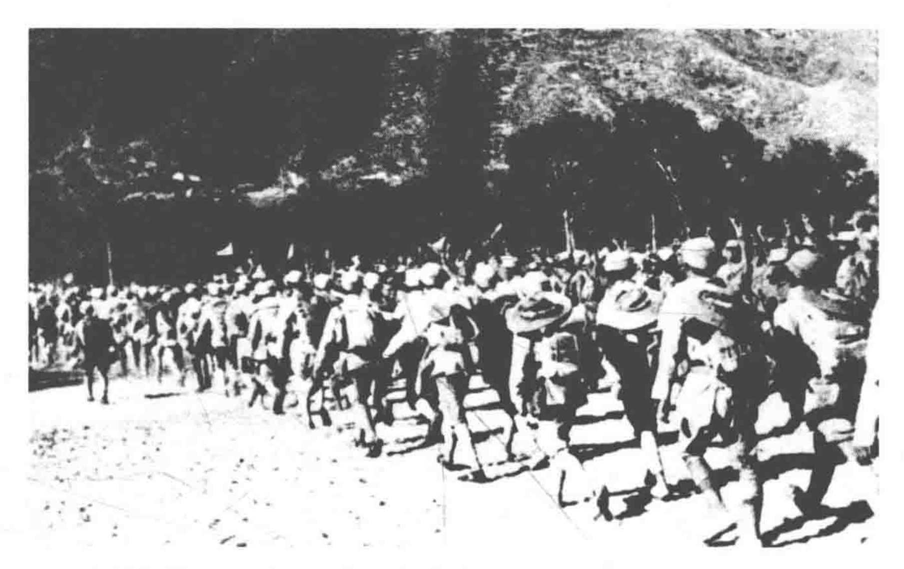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晋东北。

友军作战。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友军进行忻口战役。第一一五师主力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以1营兵力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消灭敌守备队100余人，削弱了敌人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给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八路军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还以一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时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



★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

的薄一波，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提议组建山西新军。经阎锡山同意，先试建了1个总队（团），并定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后来又相继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政治保卫旅和暂编第一师等新军武装。山西新军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

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武装组织。到1939年底，新军发展到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总兵力5万余人。这支部队密切协同八路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三大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展开。他们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组织工作团，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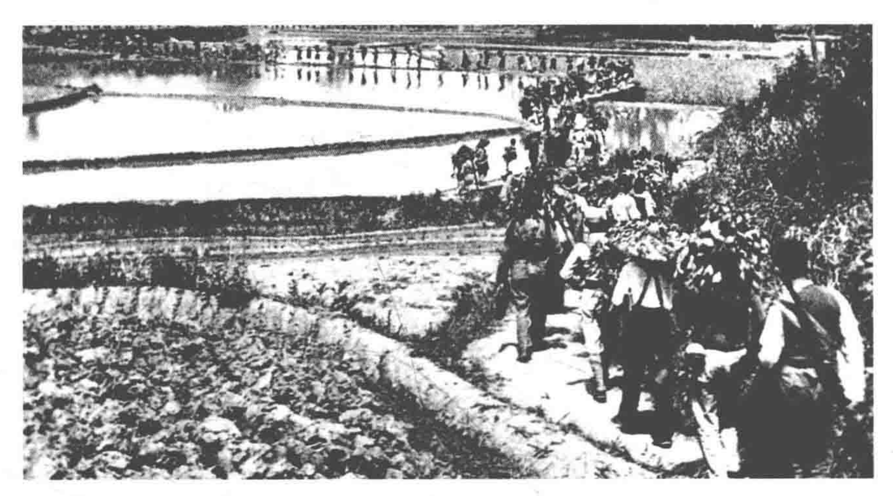
1938年1月10日，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①]。这是敌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八路军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则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1938年冬，中共中央又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这年11月下旬起，有关部队陆续出动。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在这些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

① 初称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 年 1 月下旬，先后得到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的正式批准，去掉“临时”二字。



★ 转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

实践证明，洛川会议作出的开辟敌后战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实行敌后抗战，可以缩小敌占区，并使日军不得不用相当大的兵力用于保守其占领区。这对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第二，敌后抗战能有效地积聚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沦陷区人民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但他们原来是分散的，只能进行一些自发的难以持久的反抗。所以迫切需要八路军这样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成为凝聚各种抗日力量的中心。

八路军实行并坚持敌后抗战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日军统治的薄弱环节，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机构也已经瓦解，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沦陷区的广大群众坚决要求抗日，敌后抗战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敌后农村基本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成为不怕敌人严密封锁的有利条件。由于有这些条件，共产党领导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进入敌后，便成为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能够动员和组织广大的群众，建立和发展强大

八路军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1937年8月—1940年）

图　例

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进军路线

各抗日根据地分界线

国民党侵占的抗日根据地

的人民武装。

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人民军队应该怎样作战，怎样打击敌人？共产党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实行了重大转变，就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这是弱国反击强敌侵略的有效形式。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是无后方作战，又遭遇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环境十分艰苦。如果不在敌后地区建立起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坚持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支抗日武装，使用这支武装发动和组织民众，战胜敌人的进攻；二是要发动并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在斗争中发动民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打击敌人，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就是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领导的长期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分活跃，汉、满、朝鲜等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积极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是陕甘宁边区，辖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人。边区总后方的巩固和建设，使中共中央能够顺利地指挥敌后战场，并领导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1937年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向晋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1938年5月—1940年12月）

图例

抗日根据地

我军集结地域

新四军进军路线

八路军进军路线

各抗日根据地分界线

察冀进军时，五台山已开始飞雪，部队还着单衣草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这里的关键，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鸡毛信”等紧急信件；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八路军部队不被敌人发现，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出现了“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各根据地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机动灵活地坚持打击敌人，是人民军队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它能够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

三、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在全国抗日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抗战伊始，中共中央就已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尤其是为了发展新的阵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最初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便开始出现，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偕同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主张，并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

王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中，做过有益的工作。但他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由于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虽然有王明的干扰，长江局总的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仍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和地方党的工作，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注意发展华中武装力量。这样，就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

1938年中共中央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



★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已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王稼祥回国后，在9月14日至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为较快地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要在民族战争中起模范作用。他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我们必须着重地致力并解决普遍与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必须时刻注意研究当前运动的现状及其发展。总之，毛泽东的报告和有关讲话强调，只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研究现状，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他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他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许多同志围绕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

全会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为此，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书记仍为项英）；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常务委员会，书记杨尚昆。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后退，人民抗日力量虽有发展，但仍远没有达到足以进行战略反攻的程度。为了准备战略反攻的条件，中国人民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这样，抗日战争便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局势和党的方针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国际上，日本在1938年底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加剧。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又对日本采取具有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意图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

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同南方、北方傀儡头目商谈后，于1940年凑成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则明显增长。蒋介石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的日记中多次表示：“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决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在此前后，蒋介石多次表示，抗战的目标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并无恢复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全部失地和主权的决心。会后，国民党当局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执行。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事件。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集团，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个口号的提出，使全党步调一致，也帮助党外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出现的严重危机，分清了大是大非。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百团大战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由此，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一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的配合下进行黄土岭伏击战，歼灭日、伪军9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日本朝野对此十分懊丧。日本《朝日新闻》连续3天的通栏标题都是



★ 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攻克日、伪军据点后将碉堡拆毁。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此后，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5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1.2万人南下，同新四军一起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11月，为了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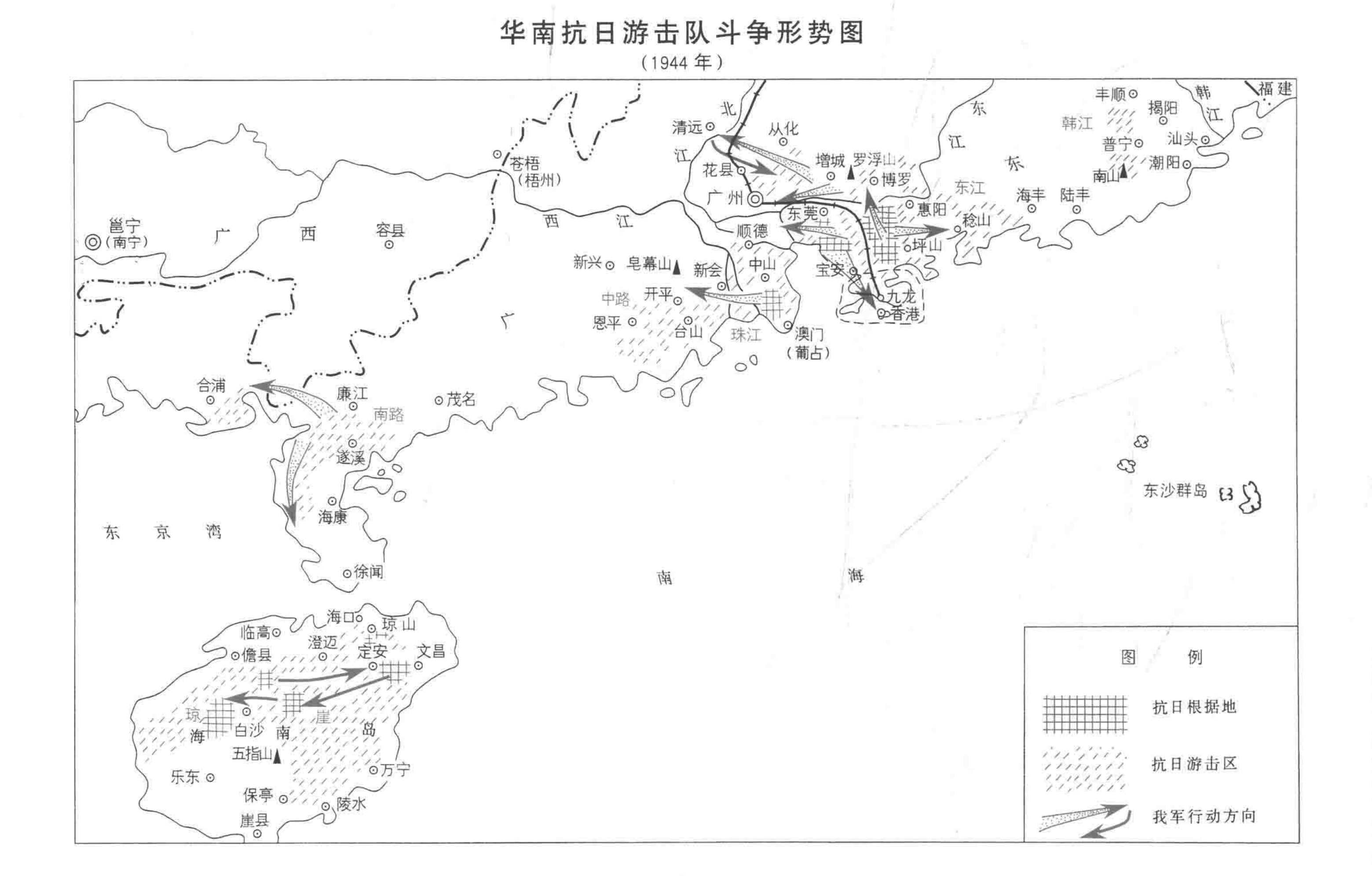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东北，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联军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1938年10月，冷云等东北抗联8名女战士陷入敌人包围后，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英勇殉国。她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县境内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在他的胃里竟没有一粒粮

★ 琼崖游击队出发袭击敌人。



华南抗日游击队斗争形势图
（1944年）





★ 东北抗联教导旅部分官兵。

食，有的只是枯草、树皮和棉絮。同年冬起，抗日联军相继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进行野营整训，并不时以小部队越境回国，继续给日、伪军以打击。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除东北抗日联军外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多位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艰苦的敌后抗战。他们中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印度医生柯棣华等。1939年11月，在晋察

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2月21日，毛泽东写下了《学习白求恩》一文（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指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白求恩在前线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1939年至1940年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发动过一些规模较小的进攻战役，如南昌、随（县）枣（阳）、第一次长沙、桂南、枣（阳）宜（昌）战役等。中国军队节节抵抗，起了牵制一部分日军的作用。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1940年8月20日至翌年1月24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史称百团大战。

八路军总部发动这次进攻战，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一方面，日本加紧诱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1940年3月和6月，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先后在香港和澳


★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破坏正太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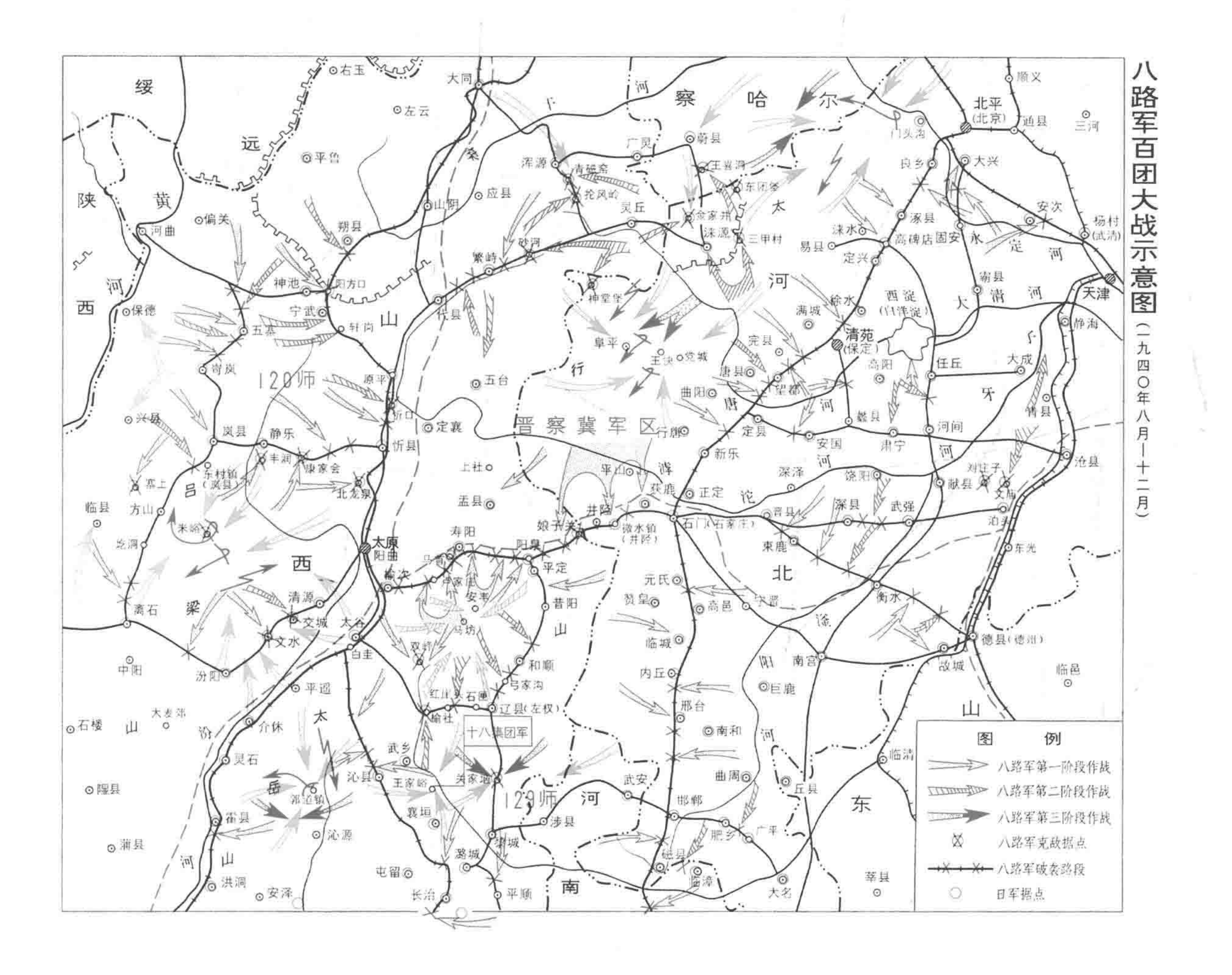
门秘密进行关于停战条件的谈判。另一方面，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①，利用重要交通线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认为，为着坚决反对投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自身的力量，应当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主要目的的战斗。百团大战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为交通总破袭战，主要是破坏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日军交通线。第二阶段是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主要任务是攻坚作战，对日军盘踞的一些据点进行攻击。第三阶段是10月上旬至翌年1月24日，主要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

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同时八路军也付出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

尽管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过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大规模战

① 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把抗日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构成对根据地的网状包围圈，然后分别进行“扫荡”和“蚕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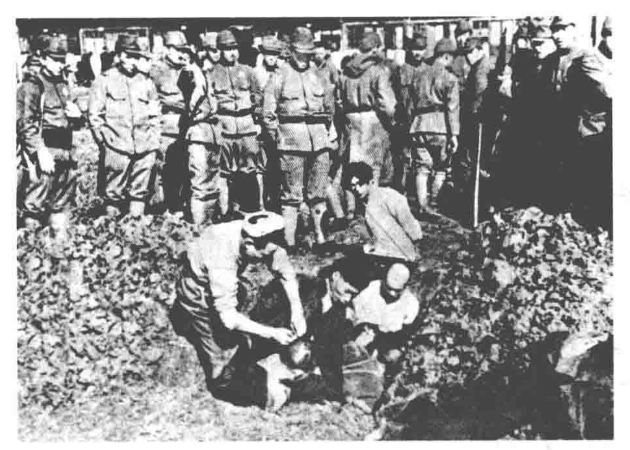
八路军百团大战示意图（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月）



役，但主要的是以分散游击的方式，在广大的地区内进行战斗，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曾经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工作过的英国人林迈可说："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领导的军队连最基本的给养、武器都没有，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他们在山西的掌权者阎锡山却不予以帮助。""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我从我的工作接触中体验到，中共的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①

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军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占领区。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空前严重、灭绝人性的罪行。





★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首先，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周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

①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杨重光、郝平译，李效黎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内封面"作者感言"。

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同时，南京市1/3的房屋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商店被抢劫一空。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死城。日军还在占领区建立多个细菌战部队的秘密基地，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毒，对中国军民实行“活体解剖”；制造配备相当数量的化学武器，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病毒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中国居民死亡。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在东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对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

再次，按照“思想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

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

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工作重心和战略策略的转变。北平、天津、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党组织，把大部分力量撤往农村。留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党员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和公开的职业隐蔽下来，扎根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其主要力量放在占领区特别是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巩固方面，大力强化殖民统治。党在沦陷区的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1940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敌后城市工作的问题。9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党的工作。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市工作部，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

在党的沦陷区工作方针指导下，沦陷区的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在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沦陷区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日军掠夺中国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企图，党组织领导沦陷区的工人以怠工、罢工等斗争形式，干扰和破坏敌人的部署。1939年，上海工潮达147次，参加者有20万人。到1940年，上海工潮继续高涨，达到427次，参加人数26.6万人。为了打击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战斗在沦陷区的党组织还利用日、伪矛盾，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

举行武装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是党领导沦陷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主要在沦陷区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小城镇，以及交通线和厂矿周围地区进行。1941年元旦，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河北井陉煤矿、河南安阳六河沟煤矿、南京浦口三井煤矿等地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后，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党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党的情报部门利用各种关系，在日、伪机关、企业和事业部门搜集铁路沿线敌人军事力量部署、炮楼封锁线和关卡设置、军队调动去向等各种重

要情报，为各根据地及党中央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沦陷区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安排转移了大量干部和进步人士，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澳门地区是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余人。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挺进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经常对日、伪军发起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党的领导下，沦陷区人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为配合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打击和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从卢沟桥事变起一直表示坚持抗战。但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过某些谋求妥协的活动。他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甚至由国

民党军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进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针锋相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种斗争，目的并不是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是为了反对投降、分裂、反共活动，使它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以重兵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40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新军对以上进攻都给予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在压住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国内政治情况，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共产党的任务仍应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在总结反磨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而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对于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向黄桥新四军无理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1.1万人。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

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系列反共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

面对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呼吁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黄炎培、冯玉祥等分别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全国数百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

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要消灭共产党。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熊向晖（中共秘密党员）及时将国民党的反共部署与动向报告了中共中央。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电，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时组织延安三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

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更多的人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五、克服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军

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人民开始进行英勇的卫国战争。在这以前，苏联同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中立条约”。签订这个条约，苏联是为了全力应付欧洲的紧张局势，避免两线作战；日本是为了解除南进（所谓“南进”，就是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海域诸岛及东南亚地区）的后顾之忧。10月，日本东条英机组阁，加快了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12月8日凌晨，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和美、英等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先后卷入战争的有占世界人口4/5的60多个国家。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宣言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将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日军的“扫荡”，牵制大量敌人。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这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海军30万人，陆军210余万人）。日本陆军用于南进的约40万人，留驻本土的约40万人，其余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军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日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

取不同政策。

在日占区，普遍建立和加强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筑寨并村，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抗日，十户皆杀），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吞并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日占区活动。

对抗日根据地，则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的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1941年1月下旬，日军“扫荡”冀东丰润潘家峪时，枪杀、刀砍、放火焚烧，共屠杀群众约1300人，杀绝33户，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五一大扫荡”，共捕杀群众5万多人，还施放毒气，毒死定县北疃村地道里的800多军民。

对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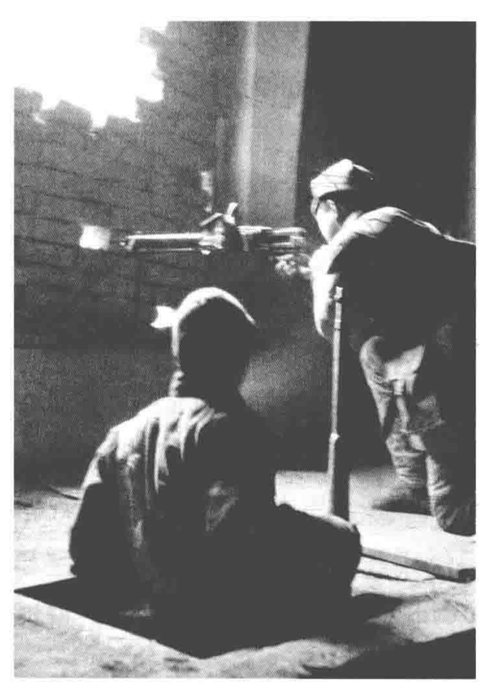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湖南长沙和浙赣等地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抵抗，并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军缅甸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因而继续加紧反共磨擦。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动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和根据地的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抗战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1942年，八

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也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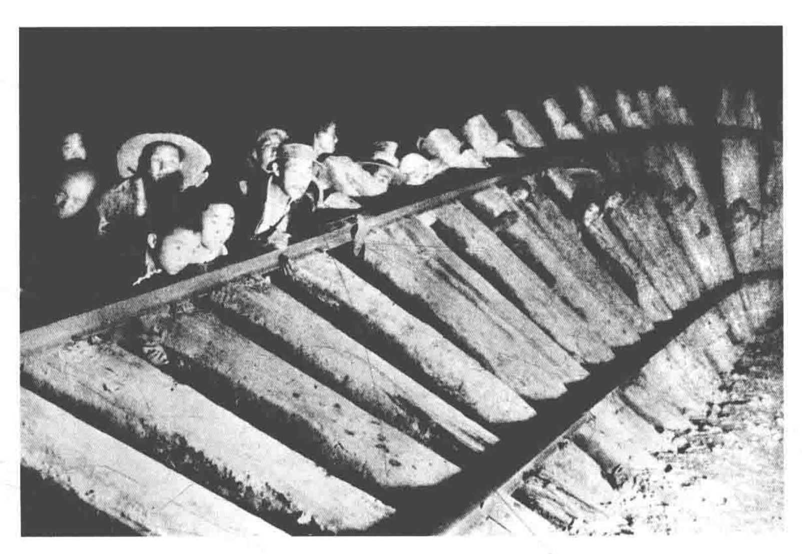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这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的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



★ 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地道战。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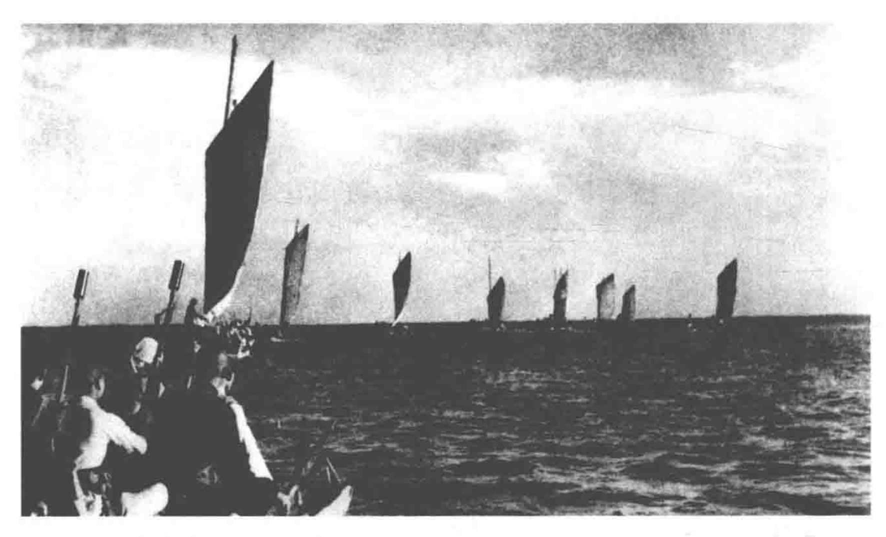
★抗日根据地民兵开展破袭战。

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民自卫武装（民兵）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

在平原，则展开地道战和破袭战。华北平原地区军民首先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敌后军民建成户户相通甚至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 抗日根据地民兵开展地雷战。





★ 活跃在渤海区的水上抗日游击队。

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成各式各样的地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进村入户就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出发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

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水网地带进行。当地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自己的小木船则出没自如，寻找机会打击日、伪军。

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是根据地军民为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而创造的新的斗争方式。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①]，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

---

① 这是党为坚持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它在表面上采用伪政权的形式和做法，但在实质上、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仍然是抗日的政权组织。当时，把这种基层政权形容为“白皮红心”。



★ 活跃在冀中青纱帐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

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母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威胁利诱她写信劝儿子投降，她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9月25日，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

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克服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

在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的过程中，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



★ 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指战员在太行山上开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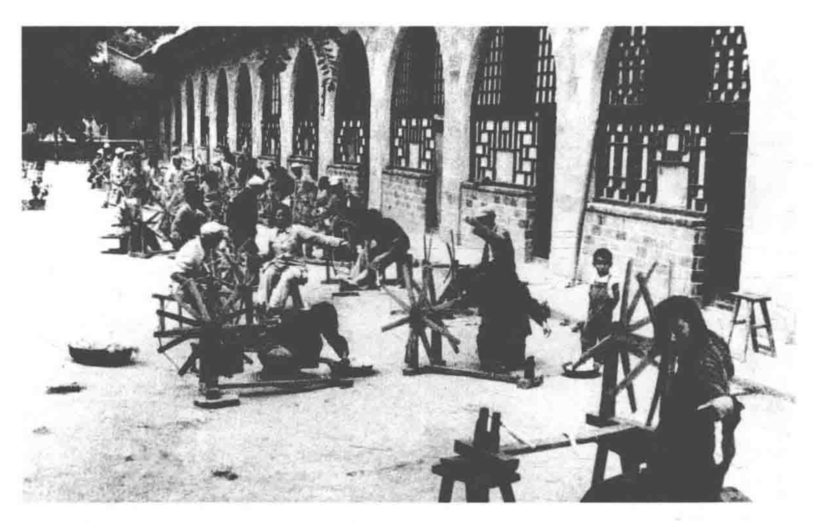
★ 三五九旅官兵在南泥湾打谷场打场。

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连排班之间，个人之间互相挑战，涌现出了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延安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三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



★ 机关干部在纺线。

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毛泽东多次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他把边区的性质、特点、意义归

结为一点，就是“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体现了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省）、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差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如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选举办法。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朱德总司令所称：“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抗日根据地重视法制建设。各根据地在创立发展过程中，依据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结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继制定、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颁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作为模范区的陕甘宁边

①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 减租减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根据地青年踊跃参军。

区，不仅颁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条例，而且在实践中创造出把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运用于审案工作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肯定，并为其他根据地所仿效。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联合地主抗日。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即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



★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训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为推进自然科学研究，同年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根据地还

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43年初，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推广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即“双拥”）运动的成功做法，倡导推动这一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形成军政军民团结齐心、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生动局面。

抗日根据地还努力探索社会建设之路。如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救灾治水，救济灾民；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行；保护妇女的社会权益，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制定社会保险政策；拥军优属，抚恤烈士遗属和因公致伤、致残人员；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通过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反磨擦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党的建设经验的积累等，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后来概括的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达，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体现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总之，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时国内广泛流

传的说法，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在牺牲着中国民族的利益”，“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他们甚至预言，除非国民党能够取得同样的成绩，在短短的几年中，共产党“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①。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来到延安。其间，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以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并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律。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他是把依靠人民、发扬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根本途径来考虑的。

六、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

① 《驻华外交官员的备忘录（1943—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3、590、596页。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页。

据地和领导沦陷区人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的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习惯上称大后方）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保持接触，并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厅在武汉举行“抗战宣传周”“七七”献金和其他各种活动，建立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及一个孩子剧团，分赴各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

在长江局领导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到1938年9月，中国南部13个省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党员人数发展到6.7万余人（军队中的党员未计算在内）。

武汉即将沦陷时，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负责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周恩来为书记（1943年6月改由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活动，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南方局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创造性地开展各方面工作。

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系，广泛团结民族工商界人士，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联系华侨、宗教界人士，广交外国朋友等，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团结他们参加抗日斗争。1941年初，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共明确表示支持，称它是“对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由于国民党当局多方刁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只得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得到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在同年9月18日创办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同年夏，在南方局的积极推动下，由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成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提出坚决抗战、实践民主等政治主张，对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武汉沦陷前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迁移到重庆以及桂林、昆明等地。南方局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文化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积极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大力支持由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戏剧演出运动。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党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11月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西北各省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整个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各界人士，

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中共中央先后派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党通过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以及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支援了全国抗战。1938年，新疆人民募捐购买战斗机10架，送往抗日前线。到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士捐款折合大洋222万余元，首饰2万余件。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等，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度过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后，进入再发展时期。1943年和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发展很快。在欧洲战场，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转入全面反攻；美、英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中国军队进行局部反攻，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在英、美军队的配合下发起反攻缅北、滇西以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美军发起越岛进攻。德、日法西斯的最后覆灭已指日可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抗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1943年，八路军在华北与敌作战2.4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余人，其中的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战场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新四军在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6万余人；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先后粉碎日军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是，同一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这是国民党统治日显腐败导致的严重后果。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加强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秘密逮捕大批共产党人、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施以酷刑或任意杀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权利被剥夺，个人财产和个人安全毫无保障。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被捕。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史良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中间阶级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日趋尖锐。美国《星期晚报》豪塞尔评论说："蒋氏大权独揽，其地位与昔日之帝王相同。""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未必完全不符。"与此同时，国民党党政官员日益腐败，不少人营私舞弊，胡作非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根本不顾前方将士正在忍饥受寒，浴血奋战，根本不顾战区难民无衣无食，流离失所。

在经济方面，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通过垄断金融业、掠夺土地、控制交通运输、增加苛捐杂税等途径，大发国难财，压制、扼杀民族工商业，致使民营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广大人民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士气普遍低落，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丧失战斗力。1944年4月，日军向中国战场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以期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日军称这次进攻为"一号作战"）。在这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外，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战场出现大溃败的局面，在8个月中，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 1944年11月，毛泽东（前中）和朱德（前左）由王震（前右）陪同，在延安机场检阅南下支队。

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当中国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时，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向被日军侵占的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

战争时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战场上的胜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出现这样的大溃败，使国民党政府名誉扫地。人民不能不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不能维护中国的独立、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能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

1944年上半年，大后方民主人士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黄炎培在重庆召开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提出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10项主张，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响应。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

结一切民主分子。这场运动，是直接针对国民党的“训政”即一党专政的，是以促进宪政来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文化界的张申府、曹禺等50人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国民党内民主人士柳亚子、李济深等在广西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发出“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铲除失败主义”的号召。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周恩来后来回顾道：就是在大后方，“一九四四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①]。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为了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从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多次会谈。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



★ 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右三）等与国民党代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权利，承认扩编中共领导的军队，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给民主党派以公开合法的地位。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毫无结果。

从豫、湘两省开始的大溃退，使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无能充分地暴露出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派人士）越来越强烈的要求。这种状况在以前还不曾有过。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各抗日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董必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受国民党迫害，在流亡生活中于7月24日病逝，根据他生前要求，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中国民主同盟也在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为坚持抗战和宣传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中国共产党还成立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对外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为中国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军用物资和贷款，向中国政府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援助中国抗战。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参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盟军中国战区陆空军最高统帅由蒋介石担任。美国派遣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华后，比较客观地了解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主张凡是中国抗日的力量，都应

得到国际的援助。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史迪威后被调回美国。

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观察组成员多次谈话。观察组成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并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况。当一批外国记者于同年6月访问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多次与他们会谈。这些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和争取民主、扩大党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

同年9月，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后被任命为美驻华大使）来华。赫尔利来华初期，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因为美国政府开始感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共产党还领导着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军队。美国希望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而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经过三天谈判，赫尔利和中共领导人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并在《协定（草案）》上签字。但是，蒋介石完全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也背弃他在延安赞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他甚至把中共同封建军阀相提并论，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不同共产党合作。美国扶蒋反共政策逐步公开化。

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严正指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就在于它助长了

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同时，中共又呼吁美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逐步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的问题，初步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

后来的事实正如毛泽东预见的那样，美国扶持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了一条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道路。

七、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提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的广泛展开，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为了适应各方面工作的需要，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与壮大，为抗战初期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同时，党内在大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长期战斗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没有受过系统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教

育；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党内；许多新建的组织还不够巩固。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随后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党的组织工作也要中国化；制定了"任人唯贤"的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提出发展党组织的方针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

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是巩固党的中心一环。为此，一方面，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学习的热潮，其后又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另一方面，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在职干部进行以理想信念、遵守纪律和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9月起，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六篇文章。这些论著为党员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巩固党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39年12月正式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此后，党员构成中出身知识分子的党员所占比例逐步得到提高。

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一直"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指出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总结18年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建设党的科学结论。

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表明了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

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顽固派起劲地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系统地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

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



★ 1942年春，毛泽东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它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



★ 《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进行整风学习。

主义。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

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 1942年5月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合影。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整风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遵义会议以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对于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等，必须加以反对。毛泽东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与此同时，也要反对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如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士不尊重等。毛泽东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整风运动又一个重要任务。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必然的表现形式。不清除党八股，不能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不能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还有藏身之地。

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



★ 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为群众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

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针对延安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讲话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会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形成解放区新文艺运动，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

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希望大家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胜利到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此后，该文被当作整风学习文件。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又提到该文，再次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②]

在全党普遍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这是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审干工作中一度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觉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纠正这个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60 页。

大工程的一大创造。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解散，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八、党的七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战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负有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大会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

毛泽东向大会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大会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

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这就使党的路线方针的顺利贯彻有了根本的保证。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就使全党有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七大通过的党章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中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个规定的主要点，在后来历次修订的党章中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严肃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进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过程中，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和限制。选举时，许多代表不愿意选王明等人，中央做说服工作，结果王明也当选为中央委员。最终，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1日，七大闭幕。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




★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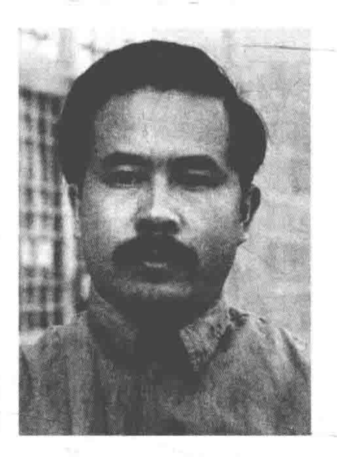
★ 朱德



★ 刘少奇



★ 周恩来



★ 任弼时

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

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在报告中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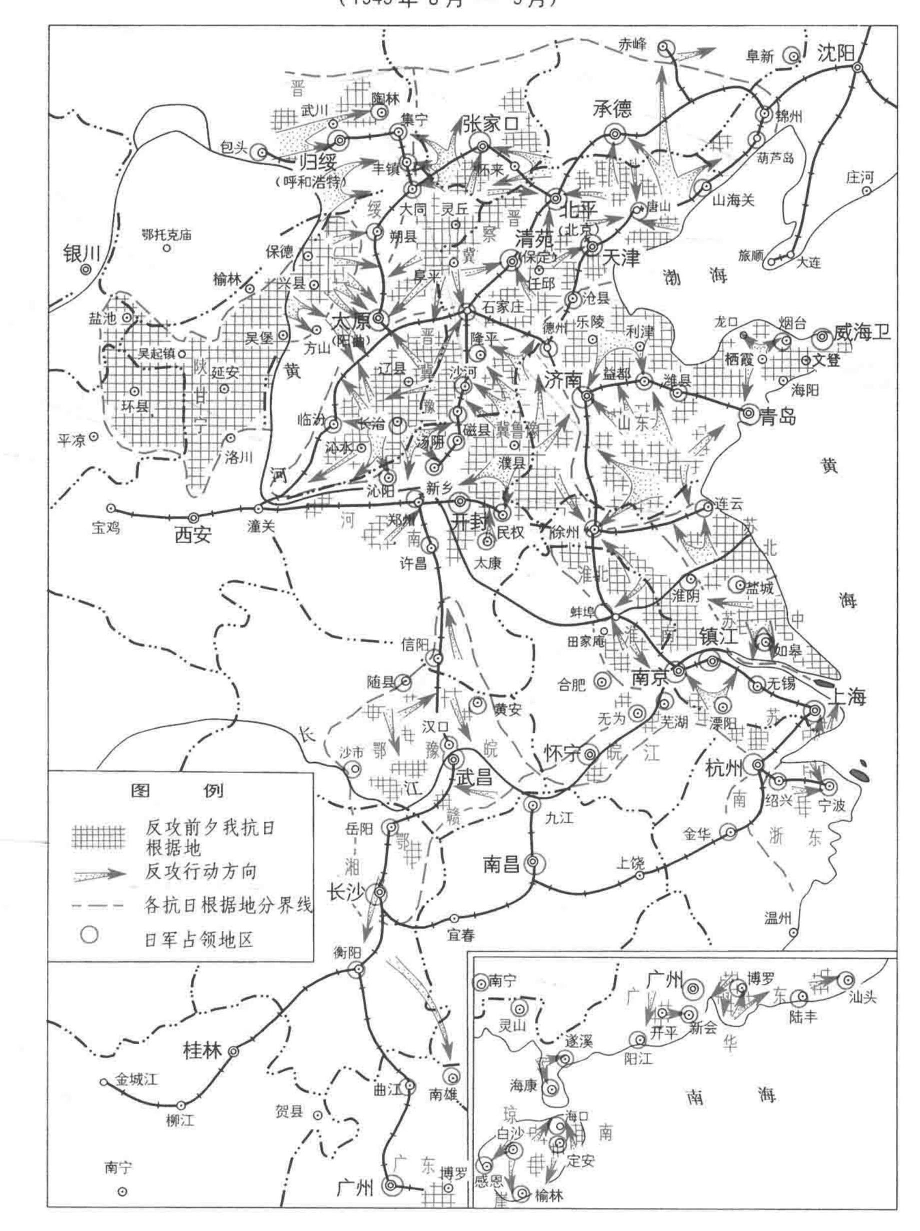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在同盟国军队于各战场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后，中国战场于1943年秋季起逐步转入战略反攻。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发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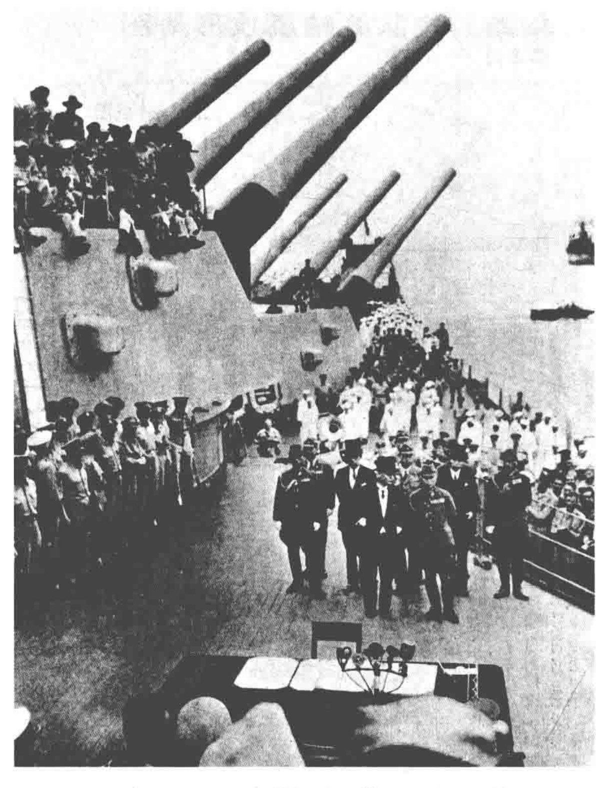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战略反攻形势图
（1945年8月—9月）



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1]

①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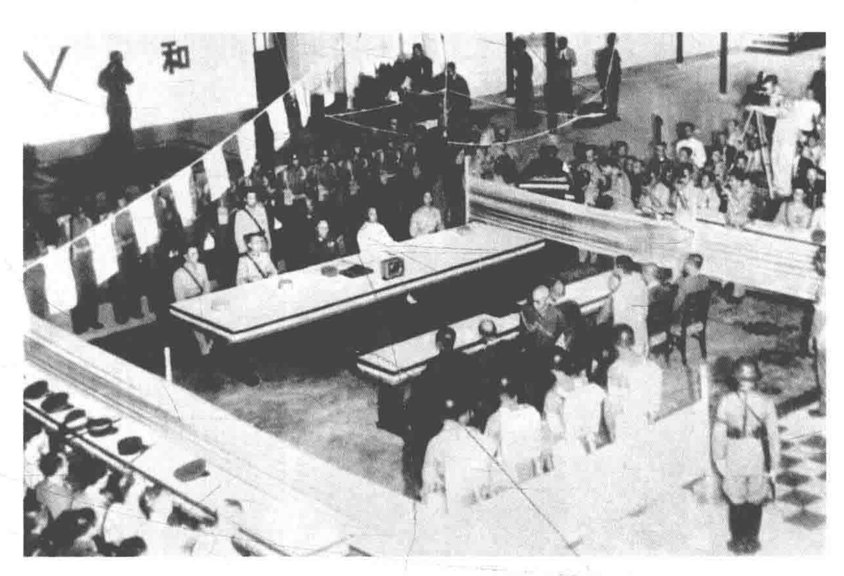
★ 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

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随即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



★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第四，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此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 解放区举行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的巧妙战术和作战方法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

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战绩统计表

（1937年9月—1945年10月11日）

类别		日军	伪军	合计
消灭日、伪军	毙伤（人）	520463	490130	1010593
	俘虏（人）	6213	512933	519146
	投降反正（人）	746	183632	184378
	小计（人）	527422	1186695	1714117

（续表）

类　别		日　军	伪　军	合　计
主要缴获	长短枪（支）	682831		
	轻重机枪（挺）	11895		
	各种口径炮（门）	1852		
作战总次数（次）		125165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章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本章提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巨大的努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坚决以积极防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党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经过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

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

战后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民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十分有利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动势力已经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解放区扩大到近1亿人口。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这是努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仍然是崎岖、曲折的。

这首先因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要和平民主。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即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是建立一

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①]。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它急于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半年左右时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在全国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采取避战观战以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蒋介石有这样的既定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严重危险。

为了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政府最高统帅部在8月11日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8月13日，新华社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战后，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说，美国政府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而短期目标首先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②]。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此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发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

---

①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9、1130页。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年第8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73年版（华盛顿），第45页。

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

为了上述目的，美国决策者曾经考虑过“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深陷中国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后来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过：这“从理论上看来，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因此，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企图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特别是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运送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重要地区，“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尽管美国当局口头上声称“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但它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最实际的支持。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方针呢？

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还在1945年春夏之交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8月24日，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尽管不顾人民要求，发动全面内战，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但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也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所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不得不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于8月中、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

中共。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在当时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因为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且，由于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党和全国人民是有可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该积极争取，也是有利的。而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局面的同时，党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必要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这个《通知》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和主张。

重庆谈判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张治中也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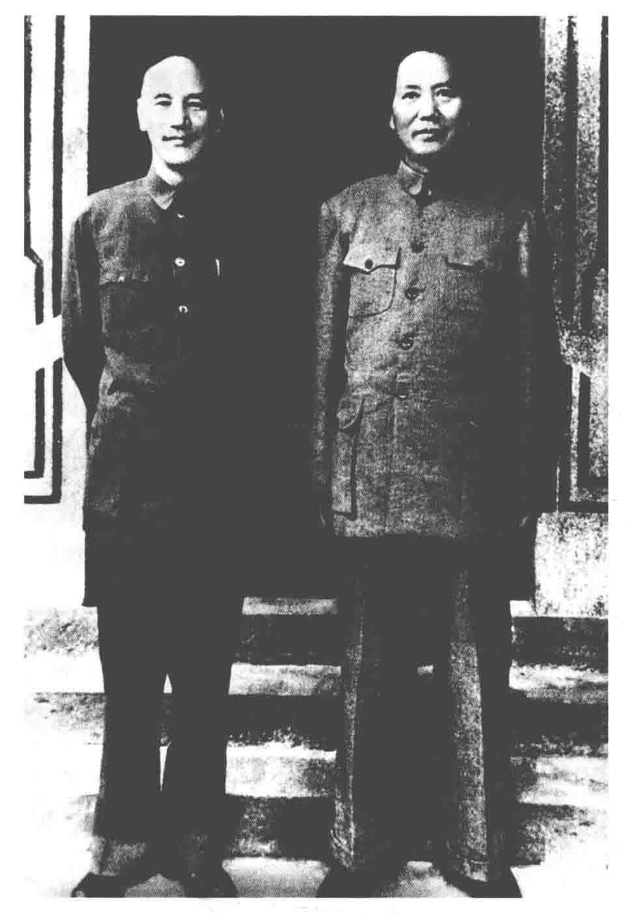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蒋介石对待这次谈判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①]，而“政令军令之统一”则是一切问题之“中心”[②]。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基本态度，中共中央事先是估计到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作出必要的让步。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这次谈判前后历时43天。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承认人民的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19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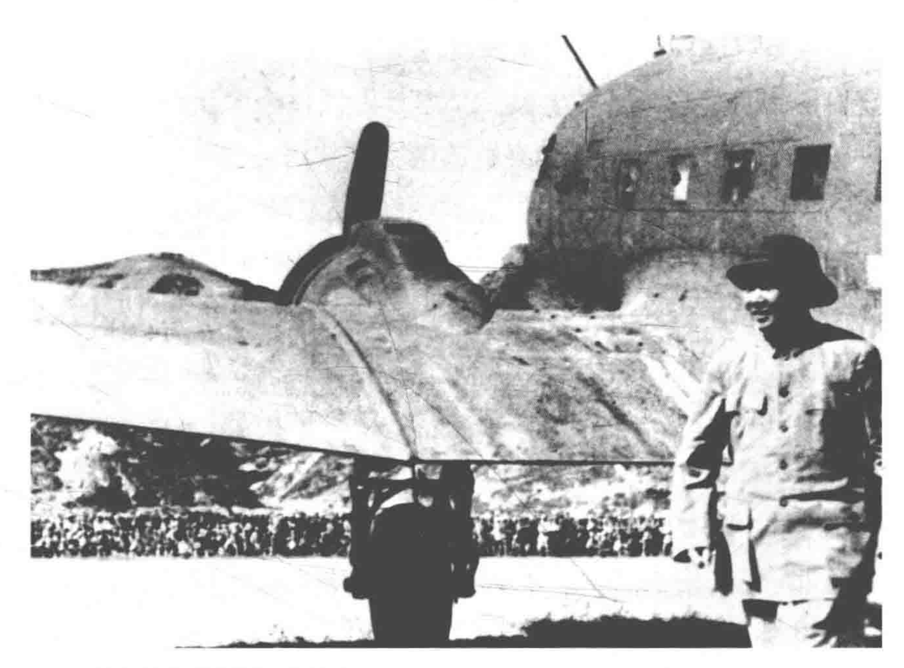


★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的让步，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还是无法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毛泽东本人于10月11日乘飞机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认



★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抵延安。

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这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它的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然后利用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中对它有利的条款（苏联政府确认在东北

“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出兵占领整个东北。自日本投降至当年10月17日两个月间，有30座解放区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包括中央委员10人（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人，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后由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与此同时，在10月中、下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又连续进行平绥、津浦、平汉（邯郸）三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11万人，迟滞了他们深入华北进兵东北的行动。在邯郸战役中，还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万人起义。

由于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并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必要的自卫作战，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

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方针并没有因军事进攻的失利而有任何改变。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11月19日，在重庆，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由抗战开始后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压迫和特务分子的捣乱，昆明3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了这场斗争。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冲

进西南联大等校，并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重庆、上海等地也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或游行示威等。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掀起，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时难以实现其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和控制整个中国的计划。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因公开表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国共争端。12月15日，马歇尔启程来华。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与此同时，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并做好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是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



★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

以制定宪法的任务。协议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协议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协议还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

政协协议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这些协议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颁布停战令时即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引者注）这些决议而奋斗”。中共中央还一度考虑，把首脑机关迁至离南京很近的淮阴，以便于商量国是。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一点。他承认：国民党“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一切”[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政协会议还在进行时，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上起哄并且动手殴打，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大哭大闹，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1946年

---

①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武协力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 页。



★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会场。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党徒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终于成为一纸空文。

事态的发展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作出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全面内战的爆发仍难避免。这迫使党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政协协议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二、以积极防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尽管有了政协协议，国民党统治集团其实已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中。蒋介石正利用这段时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9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战略要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国民党军队不仅接受了100多万日本军队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收编了大量伪军，而且美国方面还帮助它装备了39个陆军师，建立了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其军事实力进一步膨胀。1946年3月，美国还组成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和进行军事策划。6月17日，通过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美国又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援助有直接关系。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1945年11月间，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驻守的山海关和锦州等地。1946年3月初，苏军按照协议开始从东北的城市和铁路线撤退，国民党军队立刻进驻沈阳，向解放区分路进攻。4月18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的保卫战，在歼敌一万多人后撤离。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侵占长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从重庆移到南京。由于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有效的成果。

局势的发展，引起广大人民（包括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重不安。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准备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成员中，包括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宗教界等社会知名人士。6月23日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五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

雷洁琼（女）等多人受伤。周恩来赶到医院去慰问，马叙伦握着他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由于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政协协议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中央即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实际上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进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全国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准备采取自卫行动的同时，仍准备作出让步以求避免战争。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随后，中共中央又在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事实说明，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完全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手挑起的，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在它。

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更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在发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进行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同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诗人、文学家闻一多又被暗杀。显然，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共产党，而且对着

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

打败蒋介石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当时，国民党政府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193个旅（师）160万人，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的80%。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企图是：沿主要铁路干线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并控制解放区城市和交通线，歼灭人民军队主力，或将它压迫到黄河以北，而后聚歼于华北地区。蒋介石声称，倚仗国民党的军事优势，“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对人民革命力量来说，战争初期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国民党显然占着优势。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的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仅有少数火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

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坚决自卫，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国民党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很重要的因素是依恃美国政府的支持，而当时的美国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垄断着原子弹生产的秘密。中国的反动派正是以它的后台的强大来吓唬人。在国际上，当时美国正在加紧进行“冷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声浪一时甚嚣尘上。苏联

领导人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如果打内战，美苏可能卷入，中国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不同意苏联领导人对形势所作的悲观估计和“不准革命”的错误主张。他在1946年4月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要实行妥协。“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同年8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些论述，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打败中国反动派的决心和信心。

怎样才能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为此，在农村中，要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总之，要在党的领

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其中，前八个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后四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依恃他们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各解放区，企图一举消灭人民军队。各解放区人民军队沉着应战，集中优势兵力，力争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主动迎击国民党军队12万人的进攻。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接连进行7次作战（即苏中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苏中战役的重大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在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也都传来捷报。这些胜利，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


★ 1946年7月26日，朱德在延安各界反对内战动员大会上讲话。

在战争的头4个月，即从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虽然国民党军队

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153座，人民军队也收复了城市48座，并歼敌29.8万人。10月以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势头开始降落。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人民军队又经过4个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总共达41万人；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军队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进一步受挫。它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宣告破产。

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步骤使国共关系彻底破裂。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实际上宣布“调处”已经“失败”。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一再发出的警告，强行侵占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脱口向记者说了一句当时流传甚广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的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除了国民党外只有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的一些政客以及若干“社会贤达”参加）的“国民大会”，于11月中旬在南京召开，并且通过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2月，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当局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在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抽调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刚于2月下旬采取突然行动在莱芜地区全歼南犯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5.6万余人，压下了敌军的气焰，并有利于华东野战军全力向南。3月初，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60个旅约45万人，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山东战场发起新的进攻。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



★ 撤离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行军途中。

央军委指示，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5月中旬，终于抓住战机，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至7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25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为2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1/10，处于绝对劣势。他们在延安以南顽强地进行六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然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解放



★ 彭德怀（左二）、习仲勋（左三）在青化砭前线。

军西北野战兵团（以后改称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以便“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于撤离延安后45天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而后转战西北方向，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2个旅。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期间，即从1947年3月至6月的4个月内，解放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区也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然仍有95座城市被敌占领，但人民军队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总计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随着解放区军民积极防御作战的进行，内蒙古的革命形势迅速

发展。抗战胜利以后，内蒙古面临着反对新的民族分裂活动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工作及时研究，并派乌兰夫等同志到内蒙古领导开展斗争。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团结大多数，说服一些人放弃“高度自治”“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粉碎了少数分裂分子企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中共中央提出“内蒙成立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问题”，强调“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①]。同年4月，在王爷庙（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乌兰夫为主席。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端失望。一

①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194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 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狂涨、民不聊生。上海市民举行游行，提出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等要求。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隐匿、变卖。连一名国民党接收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人心”，其结果将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①。

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国抗战前夕增加47万多倍，而物价跃至全国抗战前的7255862倍。美联社上海1947年7月24日电讯曾形象地描写道：法币100元可购买的物品，1940年为1口

---

① 邵玉麟：《胜利前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76、87 页。

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个鸡蛋，1947年为1/3盒火柴。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1947年，工业产量较全国抗战前的1936年减少了30%。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和城市居民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同时，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7年，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了33%—44%。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

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线上，因而就迫使他们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以1946年12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即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学生运动的高涨

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由此掀起。

抗暴运动是由美国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引起的。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特权，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并形成独占地位，给处于危殆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以摧毁性的打击。由于国民党政府纵容，并规定驻华美军肇事只由美国宪警处理，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中国民众被害死伤者在

3300人以上[①]。事实教育了许多中国人，使他们认识到，战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

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努力“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各地党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截至1947年1月10日，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抗暴运动表明中华民族不可侮。这场斗争，帮助人们认识了美国干涉中国的活动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领导，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展起来。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月，爱国学生掀起了一场比上一年底开始的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 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① 《驻华美军一斑》,《解放日报》1947年1月10日。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同一天，在北平，7000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这就是五二〇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

五二〇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5月20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正准备在南京开幕。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这一天举行，对国民党政府是一个重大打击。当天，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反动政府的镇压没有达到它们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人民运动的广泛发展

学生运动是人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20万工人举行罢工。5月到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这就是

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特务进行镇压。3月14日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1944年秋开始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虽曾一度有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国家分裂，妄图把这场革命引入歧途，但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内部进步力量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斗争，分裂者的阴谋未能得逞。1945年秋，三区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压力，派出代表同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举行和平谈判，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根据和平条款的规定，1946年6月，新疆省政府改组，张治中兼省政府主席，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担任副主席及其他职务。新疆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又任命反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使新疆省内各种矛盾更为加剧，导致改组后的省政府破裂。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始终保持了三区革命政权。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四、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挺进中原和战略进攻的全面展开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大为减少；由于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又屡战屡败，兵力削弱，士气急剧下降，官兵中充满着失败和厌战情绪。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奋起斗争，使国民党军队的后方极不稳固。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在解放区内，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已得到巩固。

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居优势，在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这是因为：大别山区位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战略上十分敏感的部位，又是过去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当时，国民党正集中兵力于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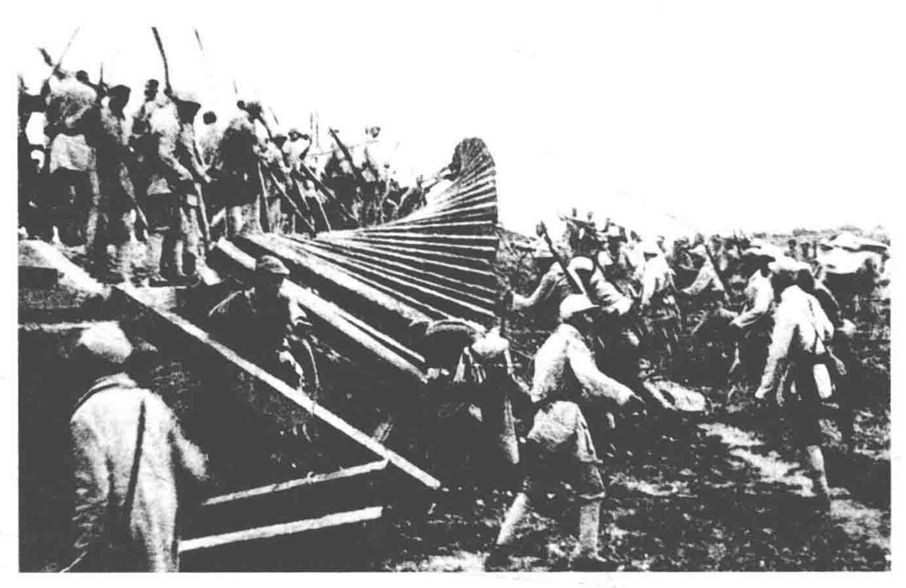
西两翼战场，中央部分的兵力很薄弱。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的。中共中央还决定，进军大别山，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种独特、大胆的进攻样式。毛泽东指出，到外线作战，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



★ 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部队在羊山集战斗中占据制高点。



★ 1947年12月，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为配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反“清剿”斗争，联合发起陇海、平汉两路破击战。

队首长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即刘邓大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部队首先在鲁西南地区打开南下的通道，接着长驱南征，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经过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在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的进军，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很快增加到30多个旅，约20万人。刘邓大军以主力一部坚持在大别山北麓就地展开，另一部分主力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部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歼敌5万余人，建立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由

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一次大胆而果断的战略行动，充分表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智慧和勇气。这一行动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这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同年，林彪、罗荣桓率东北民主联军



★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从陕北吴堡川口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相继发起秋季、冬季攻势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1948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收复革命圣地延安城。此前不久的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黄河，随后进驻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反动派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要完结了。

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整党运动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说："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后，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2/3的地方已基本上解决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问题。但还有1/3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进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了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它



★ 土改运动中解放区农民举行集会。

又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但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故后来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作了改变。它还规定：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可以组织人民法庭来保证贯彻土改的政策法令，维护革命秩序。这样就把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同由政府颁布法令、支持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土改运动得以彻底地进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如把他们的成分错定为富农或地主，摊派给中农的公粮负担过重；侵犯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如没收地主

兼营的工商业，对工商业征税过高；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或者将地主“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对地主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1947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1948年1月任弼时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也经毛泽东批示转发各地。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

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最后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 翻身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插界标。


土地房產所有證

華北區土地房產所有證第一聯

土地執照

東北行政委員會頒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东北、华北解放区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土地执照。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在解放战争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同美国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蒋梦麟后来对美国国务院人士说过：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共产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抓住了这场革命的领导权。所以他认为：美国无论怎样做，最多能推迟国民党的失败，却不能改变其结果。

在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各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问题，进行了整党工作。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主要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三查三整”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对于少数被地主、富

农、流氓分子操纵的党支部，则由上级派出工作组重新组建党支部，并协助重新组建的支部开展整党工作。

在陆续开展的整党运动中，一些地方在最初的一个短时间内出现过不加区别地把原来的党组织和党员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等“左”的偏向，伤害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感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上述偏向，使各地的整党工作逐步走上正确轨道。经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为争取土改和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五、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阐明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经济纲领和军事原则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以立法的形式表示同中国人民最后决裂。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决心打倒蒋介石。当时的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

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①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践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发展并取得胜利。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人民军队在以往作战中一贯遵循的，也是此后消灭敌人必须继续坚持的主要方法。报告同时提出，为了适应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新形势，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也应该有新的发展。比如，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又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重要据点和城市；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可能不给敌人获得休息时间；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使军队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报告说，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报告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

① 周恩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947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

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贯彻实施，报告强调，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党的十二月会议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增强全党的政策和策略观念

十二月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这是因为：第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对于如何适应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况，做好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党还缺乏经验。第二，党和军队主要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容易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工作，或者经验主义地将处理农村工作的方法照搬到城市工作中去，如不加以引导，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第三，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一些人容易滋长骄傲情绪，遇事采取不谨慎态度，这会助长“左”的偏向的发展。

尽管中共中央的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向在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它的表现是：在农村工作方面，除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等外，还有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的重要性，在工作步骤上存在急性病等；在城市工作方面，侵犯民族工商业，在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而不注意城市的生产建设，

破坏城市的生产设施等；在党与群众的关系方面，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尾巴主义倾向等。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尚未组织起来，社会秩序还有待稳定，立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条件一时还不具备。因此，中共中央指出：新区农村可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先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让地主富农多负担；待到具备实施土地法的条件，再进行土改。土改时，又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在内。这种做法，既可以满足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又可以缩小政治上的打击面，对迅速稳定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城市中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时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许多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造成过一些混乱。1948年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年4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指明应注意："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

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等等。6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此，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12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如解决好恢复电力供应、稳定金融物价、收缴敌警枪支、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发放工资等问题。而“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应在条件具备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操之过急。沈阳接管工作的经验，解决了对城市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两大难题。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至新中国初建时期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城市和成立时间、负责人一览表

（1948年9月—1950年3月）

城　市	成立时间	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北平（北京）	1949年1月1日	叶剑英
天　津	1949年1月15日	黄克诚
长　春	1948年10月19日	唐天际
沈　阳	1948年11月3日	陈　云
济　南	1948年9月25日	谭震林
合　肥	1949年1月22日	孙仲德
蚌　埠	1949年1月8日	曹荻秋

（续表）

城　市	成立时间	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芜　湖	1949年4月27日	谢振华
南　京	1949年4月28日	刘伯承
上　海	1949年5月27日	陈　毅
杭　州	1949年5月7日	谭震林
福　州	1949年8月23日	韦国清
厦　门	1949年10月20日	叶　飞
郑　州	1948年10月22日	张际春
开　封	1948年10月25日	王其梅
太　原	1949年4月24日	徐向前
武　汉	1949年5月23日	谭　政
长　沙	1949年8月19日	萧劲光
南　昌	1949年6月6日	陈正人
广　州	1949年10月21日	叶剑英
南　宁	1949年12月22日	莫文骅
桂　林	1949年11月30日	陈漫远
贵　阳	1949年11月22日	苏振华
重　庆	1949年12月3日	张际春
成　都	1949年12月21日	李井泉
昆　明	1950年3月4日	陈　赓
西　安	1949年5月16日	贺　龙
兰　州	1949年8月23日	张宗逊
银　川	1949年9月26日	杨得志
西　宁	1949年9月8日	冼恒汉

由于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各阶层居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新解放城市，对支援解放战争、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各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党开始着手建立全国性政权和统一财经的策划和准备工作。为了使华北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转变，实行党、政、军、财统一领导，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同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人民政府大力加强各级政权建设，组织全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探索和积累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

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第一，“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贻误工作。第二，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贯彻党中央规定的统一政策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避免简单化。第三，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种口号，取消党的领导作用，提倡尾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第四，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因为当时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这就要求迅速克服过去由于

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和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的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继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

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在1947年7月发布“戡乱动员令”后，国民党政府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全国被列入黑名单准备加以逮捕的竟达6万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上一点“民主”的装饰，1948年3月至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争吵，并且由于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必要时由国民党内别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桂系首领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国民党当局还积极部署他们的残余力量和地方势力，在南方和边远地区加强阵地，准备对革命人民作最后的抵抗。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个城市的10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4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并同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社会各阶层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

民主党派的历史性抉择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

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3月、4月正式成立）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任主席。民盟由六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与其他党派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1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

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利益。对于它们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正如周恩来所说，"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它们自身就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1]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

---

① 周恩来：《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 年 1 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83—284 页。

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民革等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以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的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说：“民主同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藉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

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实现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配合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等。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

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五一”号召。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据统计，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①]。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32 页。

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七、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在装备上已有很大改善，新增的装备许多是从敌



★ 新式整军运动中，解放军某部举行诉苦会。

方缴获来的，可以说是由美国经过国民党军队供应的。人民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经过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部队指挥员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进一步提高。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内已基本上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由于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和2/3的人口，但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5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集团、白崇禧集团、刘峙集团、傅作义集团、卫立煌集团）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主要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守备，能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不多。它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国民党的统治正面临濒于崩溃的局势。

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还超过人民解放军。在此情况下，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这时国民党当局正准备实行战略部署的重大变动。1948年8月，他们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计划在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利巩固华北，达到屏障黄河以南的作战目的；在西北，则力求确保关中、汉中，以掩护其对西南防线的经营。如果让国民党从容实施这种战略收缩的部署，必将增加解放军以后作战的困难。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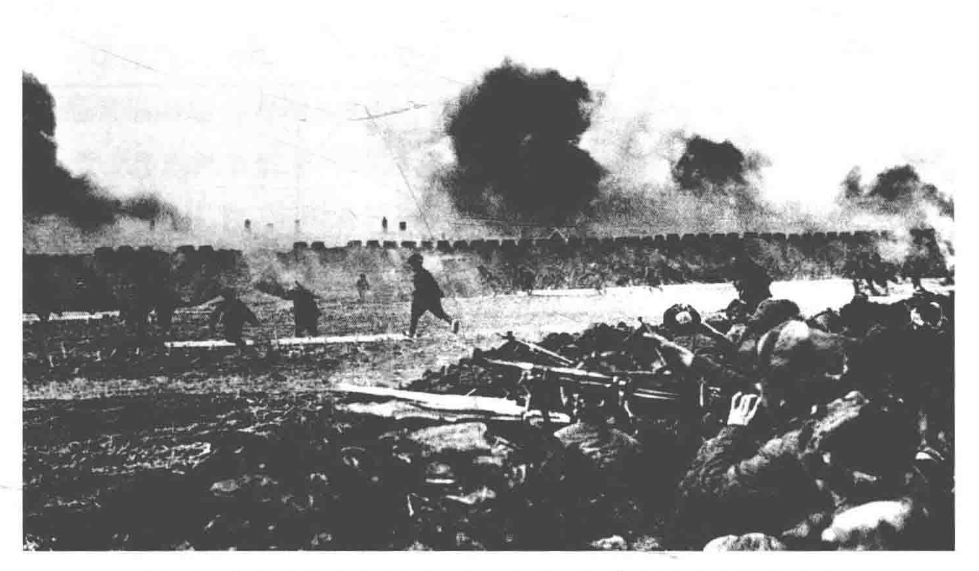
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中共中央选定首先在东北战场展开决战。当时，东北战场的态势对人民解放军也最为有利。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55万人，但已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而东北解放军正规部队总兵力达70万人，连同地方部队33万人，共计100余万人，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敌人，并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东北的解放区面积已占97%，人口占86%，2100多公里的铁路线已有2000公里掌握在人民手中，经过土改和清剿土匪，后方巩固。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夺取胜利较有把握。这样做，既可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以使东北人民解放军随后腾出手来转入关内作战，还可利用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从而有利于整个战局的发展。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在山东战场上揭开的，这就是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集中强大兵力对济南发动攻击，经8昼夜激战，歼敌11万人，取得胜利。这是人民解放军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

从9月12日开始，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对东北战场，中共中央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蒋介石对孤悬关外的55万国民党军队是守是撤，一时还举棋不定。如果让这部分军队撤向关内，国民党就可以保住这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而且可以使它同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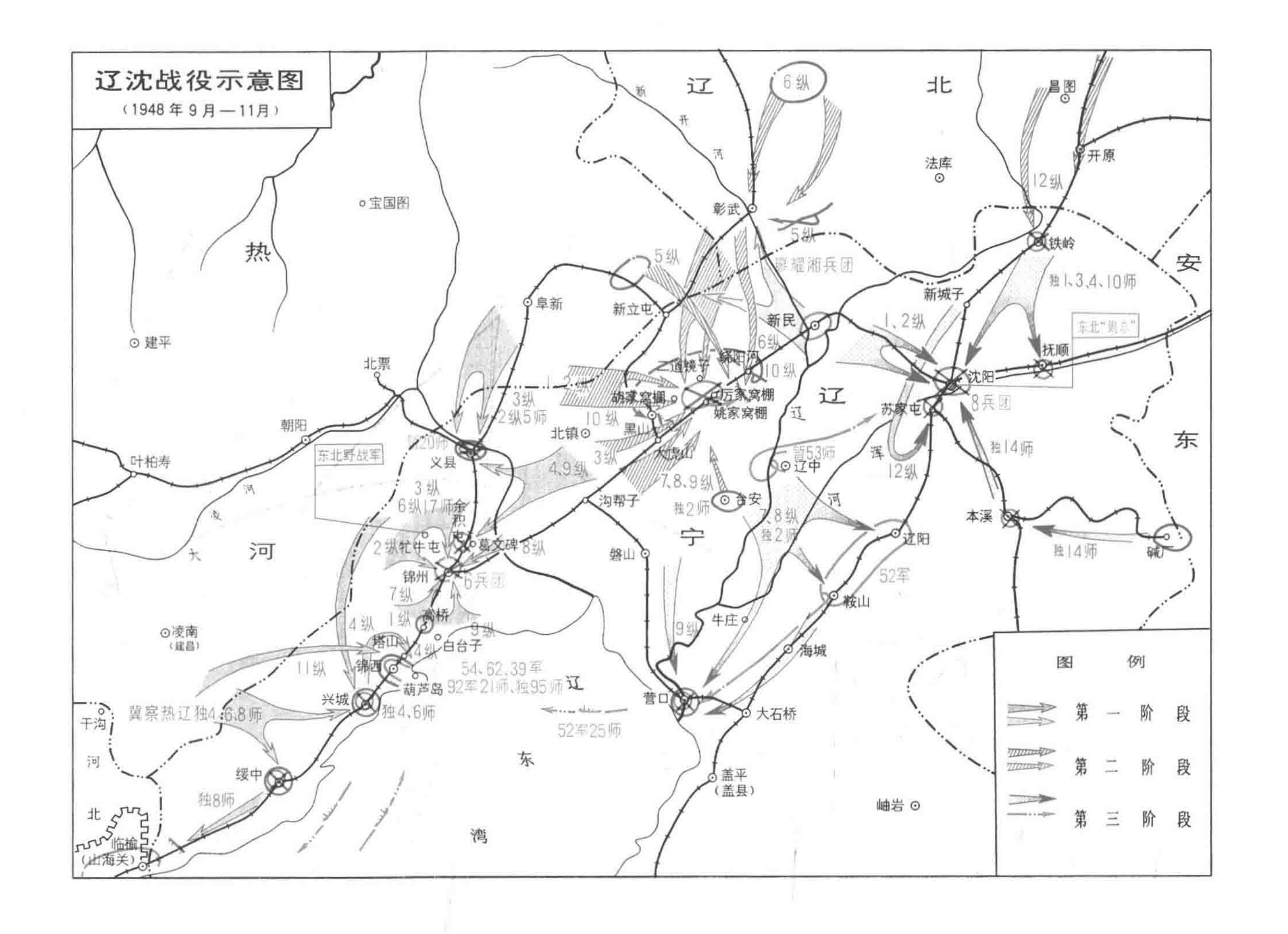


★ 辽沈战役中，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人民解放军突击部队冲向锦州城垣。

合起来，给解放战争日后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毛泽东指出，要预见到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为了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线，攻克锦州，以关死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锦作战。蒋介石急忙调集华北、山东的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解放军在塔山、虹螺岘一线对敌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敌西进兵团也被解放军顽强阻击于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锦州的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已被切断。蒋介石仍严令廖耀湘率领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十万人，生俘廖耀湘。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


辽沈战役示意图
（1948年9月—11月）
图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沈阳
8兵团
抚顺
东北"剿总"
铁岭
开原
昌图
本溪
碱厂
独14师
新城子
苏家屯
辽阳
52军
鞍山
海城
大石桥
营口
牛庄
盖平（盖县）
岫岩
法库
新民
彰武
廖耀湘兵团
辽中
暂53师
台安
新立屯
黑山
大虎山
胡家窝棚
厉家窝棚
姚家窝棚
二道境子
绕阳河
北镇
沟帮子
盘山
阜新
义县
锦州
6兵团
薛文碑
大牛屯
高桥
白台子
塔山
锦西
葫芦岛
54、62、39军
92军21师、独95师
兴城
绥中
52军25师
独8师
冀察热辽独4、6、8师
临榆（山海关）
干沟
北票
朝阳
叶柏寿
建平
宝国图
凌南（建昌）
东北野战军
热
河
辽
宁
北
安
东
辽东湾

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截至这次战役结束的当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从此，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近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①]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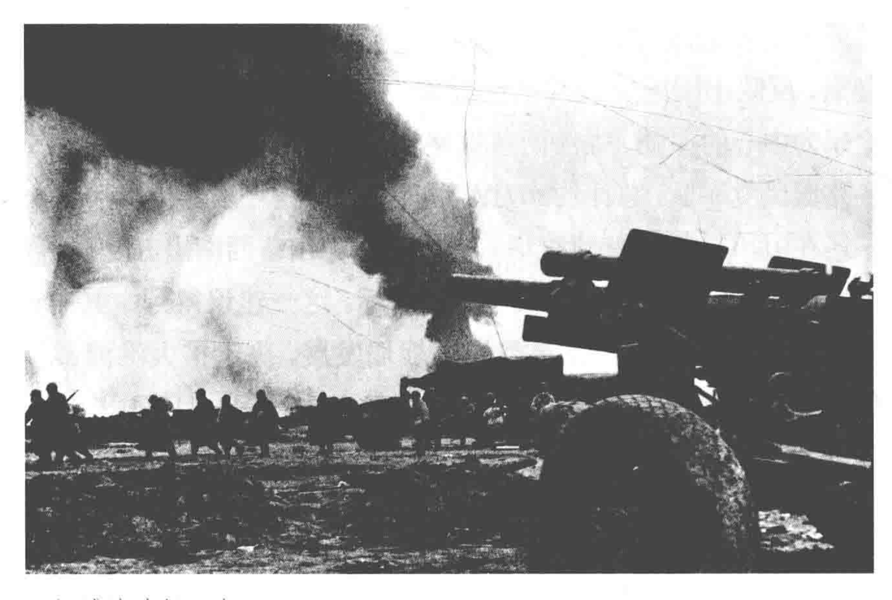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将刘峙、杜聿明集团蜷缩于徐州地区，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向南撤过淮河，据守长江。这个部署，反映出国民党统帅部在撤守之间仍犹豫徘徊。当时，据守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相交地区和从华中地区赶来支援的各路国民党军队，总计约80万人。

还在9月间，粟裕就建议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鲁西南出苏北，组织淮海战役，以歼灭徐州集团右翼一部为目标。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11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战局发展，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把"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作为总方针。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

① 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页。



★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书记）、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 淮海战场一角。

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敌委员会（即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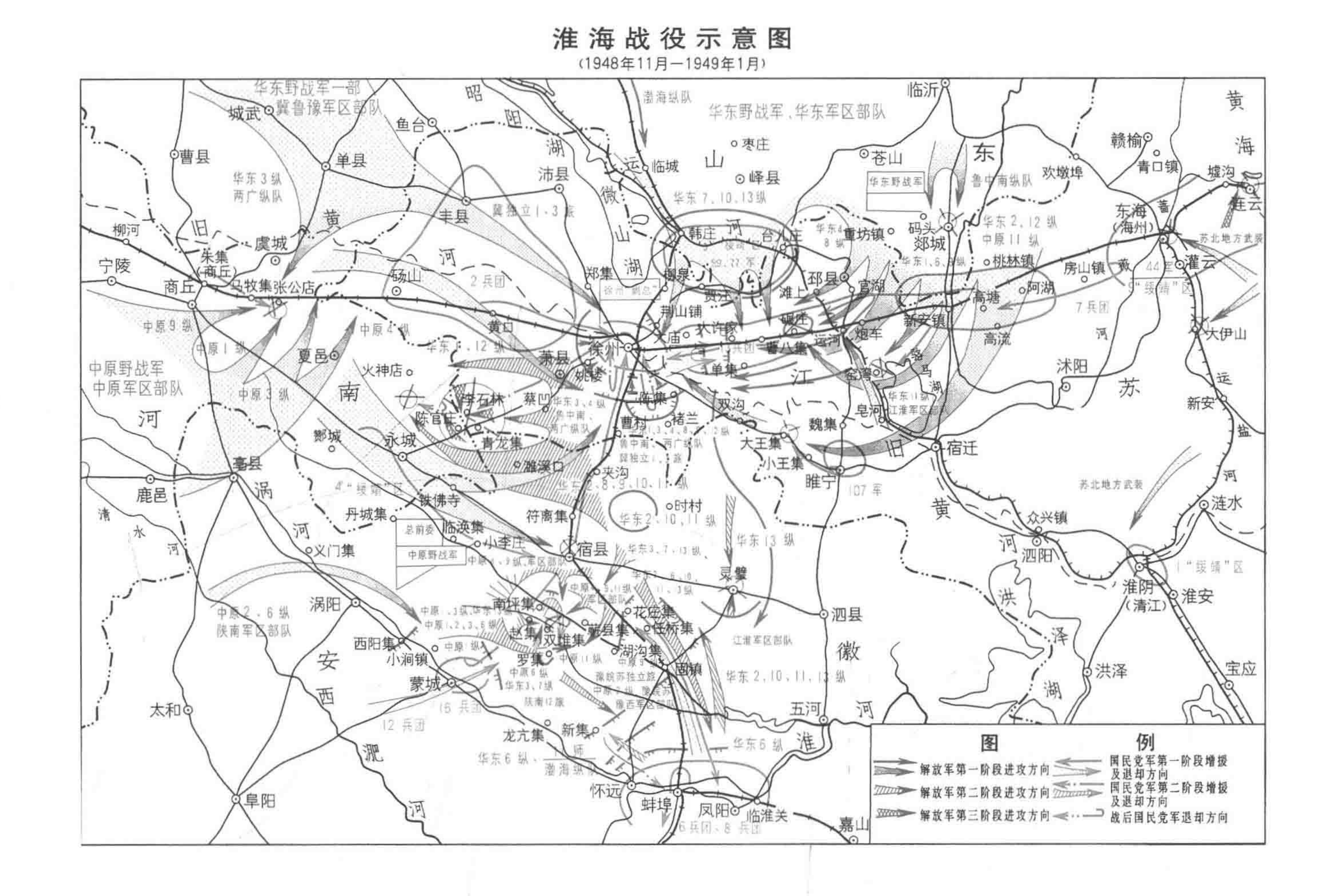
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11月6日至22日是第一阶段。这时，国民党军队的黄百韬兵团正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月6日，战斗打响。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突然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兵团的退路。各路增援的敌军都受到坚决阻击。黄兵团只得折回碾庄，被压缩在纵横不到10公里的包围圈内，到22日，全部被歼。

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约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于25



★ 淮海战役中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凯歌行进，大批国民党军队俘虏被押下战场。


淮海战役示意图
(1948年11月—1949年1月)
图例
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第一阶段增援及退却方向
国民党军第二阶段增援及退却方向
战后国民党军退却方向
徐州
商丘
宿县
蚌埠
淮阴
(清江)
淮安
宿迁
睢宁
灵璧
泗县
蒙城
阜阳
亳县
永城
萧县
碾庄
新安镇
东海
(海州)
临沂
中原野战军
中原军区部队
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部队

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浍河以南的双堆集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或者被歼，或者受阻。12月6日至1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该敌。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

从12月16日至下一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在这个阶段的最初一段时间，为了配合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淮海前线解放军曾奉命在两星期内暂停对杜部的军事攻击，主要展开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到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压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以及华北、东北军区地方部队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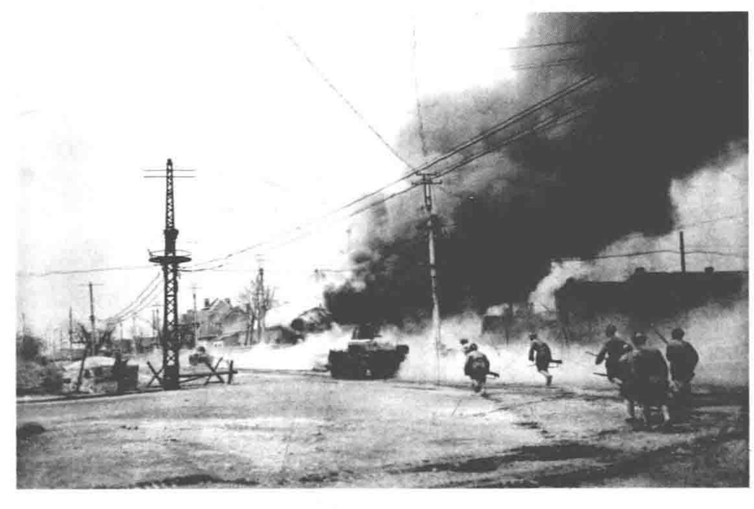
当时，华北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除有5万余人分驻归绥和大同外，有兵力50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这时，傅部为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所震慑，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根据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如果傅作义集团撤走，国民党长江防线得到加强或保存较多作战力量，这对解放军今后的作战是不利的。因此，稳住华北敌军，使它不迅速决策南



★ 平津战役前夕，聂荣臻（右二）与华北军区第二、三兵团领导同志合影。

逃或西窜，成为能否实现就地歼敌的关键。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1月23日起，就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



★ 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向拒绝和平解放的天津守敌发起猛攻。

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并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党军队进到北平地区。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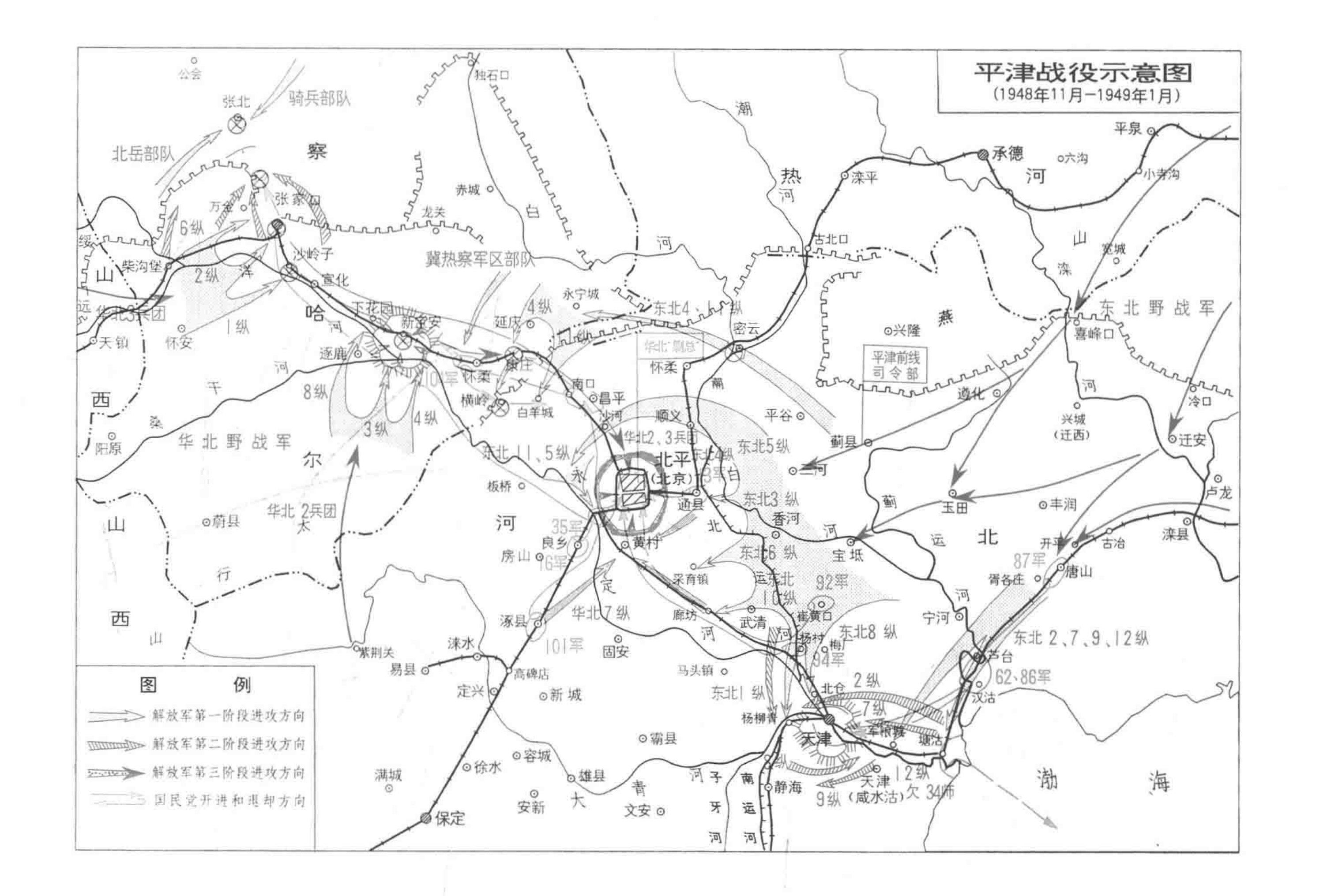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当东头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南逃。

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同傅作义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由于中共的耐心工作和各界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部移动完毕，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



★ 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盛大的入城式。


平津战役示意图
(1948年11月-1949年1月)
图例
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开进和退却方向
东北野战军
华北野战军
平津前线司令部
北平(北京)
天津
塘沽
芦台
唐山
张家口
新保安
承德
保定
密云
怀柔
顺义
通县
宝坻
三河
蓟县
玉田
丰润
遵化
迁安
冷口
喜峰口
古北口
涿县
固安
廊坊
杨村
静海
东北 2、7、9、12纵
东北5纵
东北3 纵
东北8 纵
华北7 纵
华北 2兵团
华北2、3兵团
冀热察军区部队
骑兵部队
北岳部队
渤
海



★ 三大战役期间，解放区农民在冰天雪地中用小车把弹药、物资运往前线。

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相当时间，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比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她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提供情报和做傅的工作）。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并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的巨大胜利，震撼了整个世界，也引起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极大关注。1949年1月31日，即平津战役结束的当天，斯大林委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石家庄到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2月上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会见米高扬，并向他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这次会谈，对联共（布）中央进一步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消灭后，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

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的败局难以挽回，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次年1月8日，蒋介石政府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调解”中国内战，四国政府从各自的考虑出发，也予以婉拒。这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蒋介石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社论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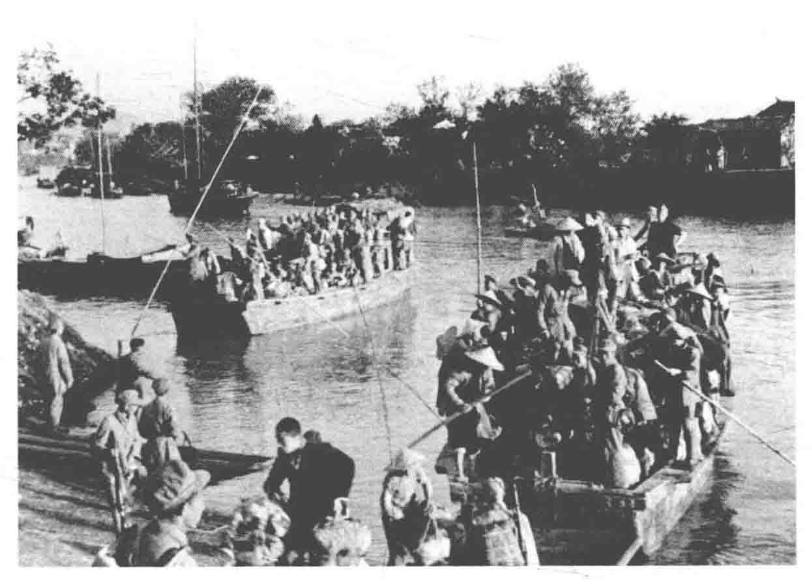
★ 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代表在北平进行谈判。

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前往他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即所谓“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同时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他计划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同时还作了最后退保台湾的安排。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谋和。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承认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是虚伪的，是为了争取时间。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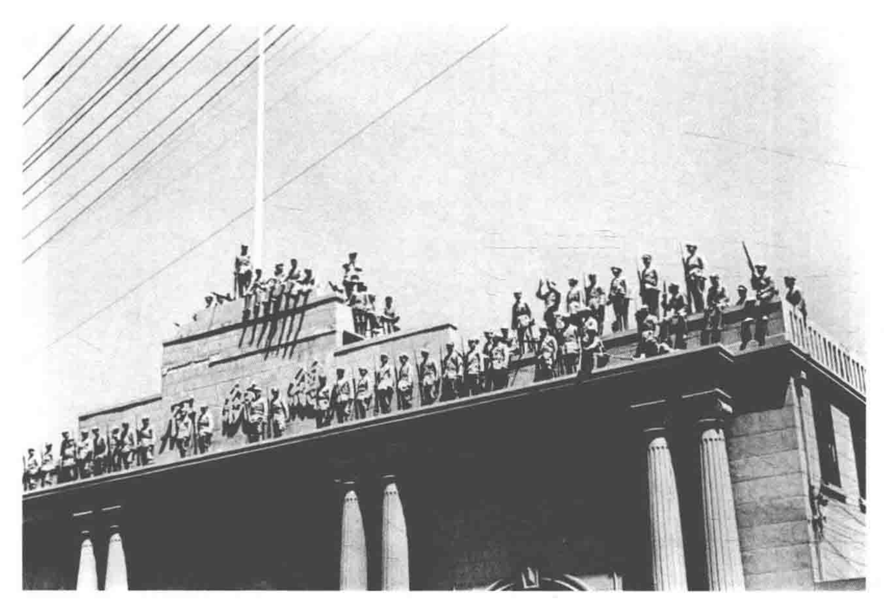


★ 1949年渡江战役开始时，人民解放军同时在各地开始登船渡江。

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但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经中共方面真诚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仍留下，多数随后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0日、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不顾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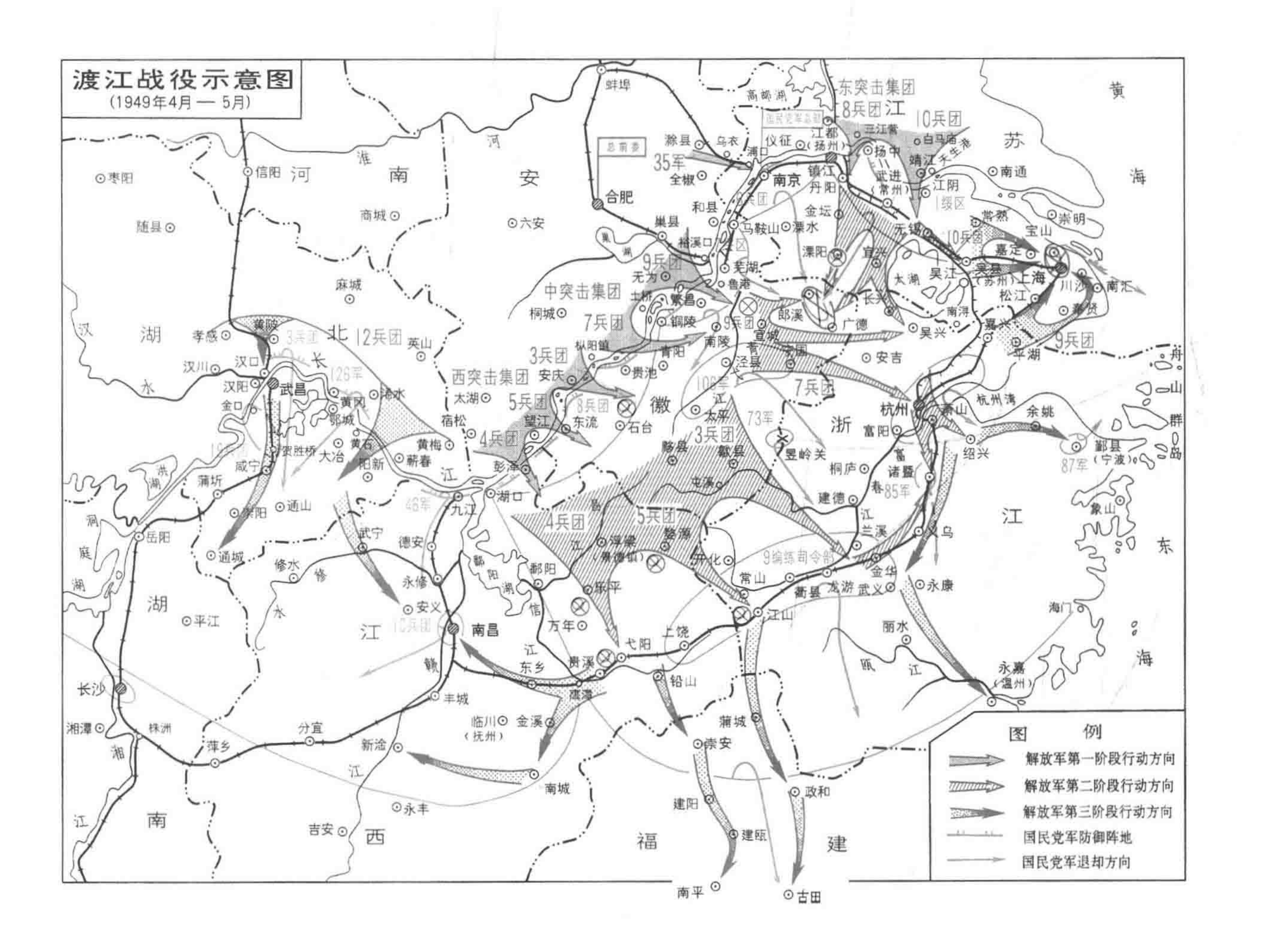


★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总统”府。

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



★ 解放上海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为了不惊扰市民，露宿街头。


渡江战役示意图
(1949年4月—5月)
图例
解放军第一阶段行动方向
解放军第二阶段行动方向
解放军第三阶段行动方向
国民党军防御阵地
国民党军退却方向

外国政府来侵犯。”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它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原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忙逃往广州。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后，解放军于5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①]。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他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因为“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新民

①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 年 9 月），《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5、136 页。



★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

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张闻天在1948年9月15日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分析了构成解放后东北经济的五种成分[①]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 原提法为六种成分，后来经党中央修改后为五种成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要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为“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的”。至于从实现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来看，更是这样。毛泽东还提出，将来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重要规定。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

不要在这种攻击面前打败仗。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从此，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争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步伐。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他指出，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奠定了后来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就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和作出了明确的决策。在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征求当时中共中



★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 毛泽东等与前来欢迎的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认为，我国同苏联的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其理由是：（一）苏联的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而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6%，并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由十月革命后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时许多民族实际上已分离成为不同国家，苏俄政府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而在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平等联合建立人民共和国。因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原则。这个看法同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今天帝国主义者想分裂我们的西藏……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我们应该“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

筹备成立新中国的工作，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

从1948年8月开始，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后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平津战役结束后，他们陆续到达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共同筹建新中国。

1948年秋至1949年夏，许多全国性的人民团体相继恢复或建立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0 页。

来，其中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这是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重要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对苏联进行秘密访问。中苏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还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借款和苏联派专家支援中国建设等问题签订了有关协定。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49年6月，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



★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

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0月9日，毛泽东当选委员会主席。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表决通过议案。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人民军队和军事建设，《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

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文化教育，《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等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它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小 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道路。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发展道路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形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建国方案，而且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场前赴

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其中，革命领袖群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功革命道路的主要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①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中国革命斗争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

①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7 页。

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

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努力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育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整风等新的形式，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由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受到人民真心的拥护和支持，能够使自己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而赢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或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标志。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创造了政治的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1/4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

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